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5月30日第152期

本期目录

【文革民生专辑2】

史林一叶

杨继绳 文革期间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

生逢乱世

徐小棣 记忆中的几样日常生活小物件

故纸堆

齐晋华提供 渔歌子录入 青岛市1970年的絮棉供应

书海泛舟

李超尘（李闯） 文革时期北京市民生活片断（《回炉——我的社会大学》选读）

毛 毛 这才知道什么叫老百姓的生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选读）

赵 瑜 难民跑城（《牺牲者》选读）

编读往来

石名岗订正一误

【史林一叶】

文革期间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

杨继绳

文革期间，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裹胁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全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伦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更需要用活生生的案例来展现。本文主要从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方面作一点介绍。

决定居民经济生活的宏观背景

改革以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¹，实行得并不顺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但是，头三年并没有计划。1952 年 8 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的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这个依据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还闹出了把上一年度的财政节余当作当年财政收入的笑话。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此时，“一五”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半。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例如 1956 年比例失调，1957 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期间出现了“大跃进”，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 1961 年比 1957 年下降了 26.4%，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被迫进行了 5 年调整(1961-1965 年)。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没有制定具体计划，只有《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中很多指标是按毛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例如，计划钢产量 3500-4000 万吨，唯一的根据是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讲过的 15 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²

“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 51 种主要经济指标有 25 种没有完成，计划力保的 30 种重工业产品有 18 种没有完成计划，11 种轻工业产品有 4 种没有完成计划。³

文革十年正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从官方公布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文革十年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靠多投入资金、多投入资源和劳动力而形成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物资人均产量下降。1976 年人均粮食产量 615 斤，徘徊 20 年才接近 1956 年的 620 斤。人均棉花产量 1966 年 6.4 斤，1976 年降到 4.4 斤；人均油料产量 1966 年 10.1 斤，1976 年只有 8.6 斤⁴；人均布产量由 1966 年的 9.8 米降到 1976 年的

¹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25 页-27 页、第 309-312 页，对“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有论证。

²梁秀峰、李建立：《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十年》，载《经济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1984 年第 6 期。

³梁秀峰、李建立：《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十年》，载《经济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1984 年第 6 期。

⁴《中国统计年鉴 1984》167 页

9.4 米。¹

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放在第一位，资金和其它资源大多用于备战，“为人民”这个目标几乎落空。

从 1965 年到 1980 年，对国防三线基本建设投资总计 2052.68 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39.01%。在 1966 年到 1970 年的“三五”时期，这个比重为 49.43%，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²

用于备战的资金不仅仅是几千亿元的国防三线投资和大量的国防经费。当时，从中央到省市，都设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向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下达常规武器和其它军用品的生产任务，其数量是无法统计的，在财政支出中，也不纳入“国防费用”这一项。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多年坚持的方针，重工业既是工业的基础，也是国防工业的支撑。

备战所需要的资金，靠压缩居民消费来积累。这可以从积累（即非消费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简称积累率）中表现出来。文革的这头三年，由于社会比较混乱，积累率有所下降。从 1970 年到 1976 年这 7 年，除了 1976 年因唐山大地震使基建工程受影响以外，其余年份都在 31.4%到 34.1%之间。按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31%以上的积累率就过高。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在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方向上，国防和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大大高于非生产性建设（住宅、医院、学校），十年文革期间，国防和生产性建设投资占 82.8%。老百姓粮、肉、油、布的消费提高很少，食用油还有所降低。³当时，农民一年也吃不上一两次肉。虽然国家发了肉票，但很难买到肉。一旦听说肉店杀猪，头天晚上就拿着肉票到肉店排长队。农民破衣烂衫，国家干部也穿打补丁的衣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裤子的膝盖上打两个大补丁外出采访也不感到难看。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来看，文革期间的居民消费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增长缓慢。（见表 1）

表 1，文革期间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人、年）⁴

年份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元/人、年)		
	全国居民	农民	非农业居民
1965	125	100	237

¹ 同上，第 220 页。

²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第 414 页。

³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载《经济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⁴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454 页。

1966	132	106	244
1967	137	111	251
1968	132	106	250
1969	135	108	255
1970	140	114	261
1971	142	116	267
1972	147	116	294
1973	155	123	306
1974	156	123	314
1975	158	124	324
1976	161	125	340
1977	165	124	361

为了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重工业和备战，政府不得不压低职工的工资水平。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文革前的 1964 年、1965 年还要低（见表 2）。大跃进时期（“二五”）和文革时期（“三五”、“四五”），职工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见表 3）

表 2，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元/年）¹

年份	各部门平均	工业
1964	661	741
1965	652	729
1966	636	689
1967	630	701
1968	621	689
1969	618	683
1970	609	661
1971	597	635
1972	622	650
1973	614	640
1974	622	648

¹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459 页，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水平比实际情况要高。1975 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制造厂调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级工，月薪 41.5 元。

1975	613	644
1976	605	634
1977	602	632
1978	644	683

表 3，不同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长速度（%）¹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1963-1965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货币工资	7.4	-1.5	3.3	-1.4	0.1	5.5
实际工资	5.4	-5.4	7.2	-1.2	-0.1	2.9

农民：家徒四壁

和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发展重工业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这笔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发展重工业的职工是要吃饭的，粮食从哪里来？靠农业。除了发展重工业以外，还要生产日用工业品，发展日用工业品的原料从哪里来？靠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中国工业化的成本。

为了让农业这个“基础”不动摇，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怎样才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呢？一靠农村组织，二靠经济政策，三靠户籍制度。农村组织就是“集体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一个农民都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中劳动、生活。经济政策主要是统购统销。农产品统统由国家收走，每个人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凭证供应。没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工业券……就没法买到生活必需品，就没法活下去。而这些票证是按行政管辖地区分配给辖区内公民的。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堵高墙，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农民被困在集体组织之中，种什么作物，如何种植，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农民没有权利参与。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到外面寻求生活——甚至有的外出逃荒讨饭也拿着生产队开的证明。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终生的活动在半径不到 100 公里的范围内。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一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对农民的严

¹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460 页，其中，“实际工资”是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后的工资。。

格的制度性捆绑，将他们逼向极度贫困的境地。

1978年，新华社老记者冯森龄¹到四十年代工作过的延安调查，看到昔日的“革命圣地”满街都是讨饭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冯森龄在延安东关食堂停留半小时，讨饭的就有17人。这些讨饭的都是来自农村。冯森龄又调查到9个县市，县县都有讨饭的。²延安边区时期劳动英雄申长林所在生产队28户人家，家家都缺粮食，80多人出去讨饭。³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是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七十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时候。⁴

1978年，全国每个农民从生产队里得到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80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西北地区的农民收入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地区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⁵

1978年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四户没有大门，三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国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中共凤阳县委给上级的报告中列举了逃荒的人数：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9900多人，至3月18日，达18000多人，大部分去南京和苏北。1969年3月，37%的农户和23%的人口外流，流动范围为皖、苏、浙三省。1970年春节，4000多人外流。外流就是出外要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庄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五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湖北省浠水县睡虎村被密密的树林和竹林掩映，其中很多两人合抱的大树。在树林和竹林里捉迷藏成为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但是，到七十年代末期，村子里几乎看不见树木，成了大地变

¹ 冯森龄，1940年入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文革后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

² 冯森龄：《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讨饭——延安调查之一》，载新华社1978年8月24日（内参）。

³ 冯森龄：《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到100公斤——延安调查之二》，新华社1978年8月24日（内参）。

⁴ 傅上伦 胡国华 戴国强：《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⁵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成“秃头”的“和尚村”。农村不仅人穷，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农业学大寨运动将农民推向“改天换地”的苦役之中。1970年代，我老家生产队长、也是我儿时的好友张志东对我说：“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他还告诉我，浠水县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集体自杀的事件。这些小姑娘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不堪忍受人民公社对个人自由的严酷控制，五六个人或七八个人手拉着手、或用绳子串在一起，集体投河。听到儿时的好友的介绍，我的心颤抖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希望他们到浠水去作点调查，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湖北分社老记者田庄和郭万里对我说：“少女集体自杀的事，最严重的是红安，不是浠水。”我又向总社分管内参的编辑张述忱反映了湖北的这一情况。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湖南，不是湖北。”

这时我才知道，少女集体自杀这种惨案，在各地都有发生的。那时我就希望中国农民早一天摆脱人民公社的桎梏，尽管我在1958年曾多次真诚地喊过：“人民公社万岁！”

工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在城乡差距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他们收入低，住房狭小，工作环境恶劣，还要“革命加拼命”地工作。

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是工人家庭的全部收入，城市居民除了工资没有其它收入。职工的工资由国家直接掌握，每隔几年调整一次。在196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内，工资基本没有调整。从前面的表2的数据可以算出：1966年到1976年，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全国各部门平均工资降低了4.9%，工业部门平均工资降低了7.98%。

1970年代后期，开始每隔几年调整一次，但每一次调整，只给予一定比例的职工，因而把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化为工人之间的互相争夺。1980年我到天津市劳动局（负责调整工人工资的主管部门）对当时的工资调整进行了一次调查。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调工资的情况，现将调查材料抄录如下：

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多起恶性事件 应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从年初到七月底，天津市在评定工资过程中，发生了服毒、投河、跳楼、自焚

等自杀事件 21 起(死亡 3 人), 行凶杀人未遂事件 9 起, 绝食 5 起, 出走 4 起, 还发生了多次打人事件。

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 27 岁的二级工黄德江, 由于没有评上工资, 往自己身上倒柴油, 自焚身死。库工石敏(21 岁)、王岚(20 岁)在调资中喝了敌敌畏, 经抢救, 王岚脱险, 石敏死亡。二轻局锅炉修造厂女工孔庆延, 评资时第二榜无名, 她找领导反映评分不合理。后来她听说第三榜又没有她, 就喝了一瓶敌敌畏。经抢救脱险后, 她说: “评不上还得死。”在一些单位还发现有人身带匕首, 准备和人拼命。

天津市在这次调整工资中矛盾十分尖锐。有人用影片的名字描述评工资的几个阶段: 思想动员阶段是《沉默的人》, 谁也不表态; 发榜前是《激战前夜》, 都在想办法如何压倒竞争对手; 从头榜到三榜之间是《生死搏斗》, 打架、斗殴、凶杀事件多是在这时发生的。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工人殴打, 不得不逃到外地去避难。

一些负责调资工作的干部说: “其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根本原因是调资政策有问题, 工资制度本身不合理。”

天津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反映, 这次调资工作有很多不妥之处。首先, 这次调资和 1977 年的调资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连续性。上次基本是按工作年限, 解决低工资问题。但是, 由于升级比例的限制, 当时有一些年限长、工资低的人没有升级。由于这次不考虑工作年限, 这批人还有可能升不了级。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同时, 这次规定的三条原则(贡献大小, 技术高低, 劳动态度好坏), 在具体执行上很难掌握。特别是一些集体操作的工种(如炼钢、轧钢等)和科室干部, 要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是很困难的。因此, 有些单位不得不在没有差别中找差别, 在没有矛盾中找矛盾, 人为地制造了很多不团结因素。

很多同志认为, 这种每隔几年提高一部分人的工资的作法有很多弊病。确定升级的比例不是根据实际上有多少人需要升级来确定, 而是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来确定。国家能拿出多少钱, 就让多少人升级。这样确定的比例(如这次的百分之四十)和实际需要升级的人数相差悬殊。

在我国目前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 工资本来是劳动者和国家的经济关系, 他付出了多少劳动, 国家给他多少工资。调整工资应该是调整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评工资却变成了劳动者之间相互争夺的关系, 把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之间去了。这是很不合理的, 也是有害的。

1975 年, 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 工厂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80%以上是二级工, 月薪为 41.5 元, 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 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

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现将我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得到的职工生活情况抄录如下：

时间：1975 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 345 人，家庭月收入情况如下：

人均收入 10 元以下的 8 人	占总人数的 2.32%
人均收入 10-11 元 6 人	占总人数的 1.74%
人均收入 11-12 元 7 人	占总人数的 2.02%
人均收入 13-15 元的 28 人	占总人数的 8.11%
人均收入 15-20 的 65 人	占总人数的 18.8%
人均收入 20-25 的 231 人	占总人数的 66.95%

其中，人均收入达 25 元的只有几户。

人均收入 10 元到 13 元的生活状况：不能保证每顿都有熟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批低价处理的白菜。国家标准供应的生活品不能买全(如鸡蛋、糖)，很少吃肉，多吃粗粮。布票等证券不能买全。

人均收入 15 元的生活状况：在没有病人或上山下乡的子女不需要定期补助的情况下，一般都能买全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的物品。有时还能吃点肉。

人均收入 20 元的生活状况：一般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天津棉纺一厂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国营大厂，电动车间的老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高于其它车间。其它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棉纺一厂低。当时天津市人均收入在 12 元以下的家庭约有 6%，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怎样呢？请看天津棉纺一厂二布挡车组工人张淑珍的状况：

张淑珍每月总收入 35.7 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我抄下了她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

粮食总定量 127 斤(面粉 51 斤，杂粮 76 斤)，计 18.92 元	
煤 400 斤，5.6 元	线，0.64 元
引火柴一份，0.65 元	卫生纸两包，0.52 元
肥皂 6 块，1.26 元	卷纸两卷，0.2 元
食油 2 斤，1.7 元	墨水一瓶，0.18 元
盐 3 斤，0.45 元	处理白菜 120 斤，1 元
酱油 2 瓶，1.24 元	供应白菜一份，0.91 元
碱面 4 两，0.06 元	灯泡一个，0.03 元(月)
蜡烛 4 根，0.4 元	学生用本 6 个，0.42 元
房租(一间)，1.2 元	铅笔 6 支，0.16 元
汽车月票一张，3.00 元	擦脸油，0.2 元

清洁费，0.15 元 卷烟，2.8 元
火柴，0.16 元
总计 42.05 元，人均月消费 10.513 元。

从张淑珍的开支看，当时的物价是很低的。1966-1976 年间，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见表 5)。文革中，毛泽东一再批评商品经济，主张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投入了监狱。没有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一切听命于各级行政官员的指令。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西方经济学有一句名言：要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麻痹这个国家的价格机制。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过度行政控制，价格被冻结。这对工资一直很低的职工当然是必要的，但对经济活力有很大的杀伤力。

表 5，文革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 1950 年为 100)¹

年份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物价指数	134.6	134.2	133.2	133.3	131.5	130.2	131.0	131.7	131.9	132.3

经济停滞，就业机会少。政府只好强制 1700 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将城镇就业矛盾向农村转移。下乡知识青年不能维持生活，城镇的父母不得不给以接济，这成了职工家庭的一个沉重负担。

1966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一个文件，说奖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认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和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政治挂帅。此后，工厂的奖金改为平均发放的“附加工资”。工厂里不断组织工人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长期漠视职工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1972 年，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统计，工人八小时工作一般只能干四个小时。我在天津汽油机厂和工人一起倒班的劳动中发现，全厂 87 台设备，白天开动的只有 11 台到 14 台，夜班两点以后开动的只有两台。开这两台机器的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被监督劳动的“历史反革命”。这个厂老工人说：“现在我厂一年生产汽油机 3500 台。要是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工艺设备进行一些改进，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产两万台。”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有的工厂欠工人五十多个休假日，也不能兑现，相反的是工人迟到几分钟也要记下来，累计起来扣工资。天津染料化工行业取消了夜班补助费，工人不愿上夜班了，化工生产是连续的，夜班开不

¹ 《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425 页。

起来，变成间歇生产，产品质量因而受到影响。¹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紧固件工段劳动了一个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为了检测工人的劳动潜力，我在一台万能铣床上加工一个零件。我不紧不慢，工人休息时我也休息，一个夜班出的活儿竟超了定额(即每个班的工作量)的一倍!我这样干了两天，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杨同志，你是飞鸽牌，我们是永久牌，你要悠着点!”工人担心，如果厂里知道了我轻松地超定额一倍，就要提高定额。

居住条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上海《解放日报》(1988年10月14日)公布了一个数据：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这还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同一天的《解放日报》还记载了文化革命期间两位外国人在上海的观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签署著名的“上海公报”的时候，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也随同到达阔别多年的上海。他的观感是，除了殖民地时代的华丽建筑，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他的脑海里再没有留下任何其它印象。

1974年，法国社会学家朗兹先生私自考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将考察结果写了一篇札记。札记中写道：我看到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起来的一间小屋。屋顶披着歪斜的油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都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状。至多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却住着五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这两位外国人真是少见多怪。我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所看到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比他们所描述的还要恶劣得多。

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妇睡在床上，已经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已经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我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这样的居住条件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

¹ 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年10月21日。

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一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 39 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锅铲炒菜的动作，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工作环境

1972 年 9 月 14 日，天津职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他们新完成的一个调查：

在对天津市 981 个工厂的 37720 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	343 人
苯中毒	39 人
白血球降低	86 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	134 人

天津棉纺二厂三纺筒子车间 184 名职工患病的达 126 人，占百分之 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种以上。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 125 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 1500 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 85 人中有 76 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 89%。

当时，要求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起了一些激励作用，但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在成昆铁路通车的时候，同时建立了一座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有 227 个坟头，这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师牺牲的烈士。在全长 1100 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上，这样的坟头有一千多处。1968 年，一个 4000 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进了半个排的战士。¹

一方面鼓吹在生产中“革命加拼命”，另一方面把必要的企业管理当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来批判，企业管理非常混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成了普遍现象。天津染化四厂酞青车间工艺规定温度在 170 度-175 度(摄氏)的范围内保温 15 小时，工人为了早下班，只保温 14 小时，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岗位无定员。天津第二毛纺厂细纱机过去一人看两台，现在 15 台机器，每班 35 人。天津冶金局同样的 3 吨电炉，有的用 27 人，有的用 35 人，D5G 拉丝机有的单位

¹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第 437 页。

两人看三台，有的单位一人看五台。¹1971年末到1972年初，据国家有关部门对8373种产品检查，产品合格率平均为45%。工伤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国家有关部门对11个部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严重损坏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²

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

文革期间是对知识分子歧视最严重的时期。毛泽东批示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虽然这个文件是1971年出笼的，但这种思想从文革一开始就有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普通知识分子的日子也不好过。

科技人员工资低。1957年中专毕业生当技术员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进厂的学徒工(小学文化或更低)1972是四级工，拿57.6元。许多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1972年只拿50多元。他们说：“当时要是不上大学，参军或当工人就比现在强多了，读书吃亏了！”比工人更加困难的是，科技人员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两地，这些人没有家庭生活，成年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年两个星期的探亲假，来回车船等交通费耗尽了一年的积累。天津市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夫妻分在两地的，有的单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天津市属研究所51个，文化大革命中关、停、并、转，砍了一大批，1972年只剩下25个，人员也减少过半。大批科技人员不在科技工作岗位上。据调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员当普通劳动力使用。在科技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从事科研工作。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除了“拉练”(一种把队伍拉到野外去的军事训练活动，如步行数十公里等)、劳动，每年只能工作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每个星期只有四天业务活动时间。此外挖地道(备战)、搬白菜、搞卫生、帮领导人写总结，随便什么人，一句话都可以调走。一机部天津电力传动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哪里需要人，不管我们业务多忙，谁都可以把我们吆喝去！”

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当然不会有创新；不重视科技，技术水平必然落后。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从事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市纺织行业的机械设备三十年代的占55%。天津机械行业的设备大多处于三四十年的技术水平。天津化工行业生产群青颜料还是用小土窑炼烧，和《天工

¹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年10月21日。

²柳随年 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8页。

开物》上所介绍的差不多。天津碱厂是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在三十年代提出联合制碱法(侯氏制碱法)的基地,这种先进的制碱工艺战后被日本广泛采用,而天津碱厂 1972 年还在用比较落后的苏维尔法生产。¹

【生逢乱世】

记忆中的几样日常生活小物件

徐小棣

假领子和它背后的故事

我在内蒙兵团当“知青”时还不会做针线活,同班“战友”贵银为我缝过一条假领子,我一直心存感激,但直到 2008 年久别重逢,我才更加了解了那条假领子和它背后的故事。

假领子在我们那儿风行于 1974 年,上山下乡的第五年。

我们从下乡时十六岁的小姑娘真正走进了如花的青春,女性本能似扑不灭的烈焰,对美的追求抬起头来。纵使豆包布“军服”洗得发白,磨出了毛边,我们也有时尚的穿法。先在枕下把它压平,穿时敞开衣领,翻个一尺花布缝成的假领子出来。那光鲜的假领子盖住样式统一的豆包布本色衬衫,毫不张扬地烘托出年轻的面孔,不论美丑,只要身段过得去,都能靠这朴素的点缀显出灵秀,平添些“春色”。不过明艳的只是一尺布,人人知道在外衣第二颗纽扣以下的里面就不再有同样花色的内容,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心满意足。

假领子可真是那个又穷又革命的时代里绝妙的创新之作。前襟不到五寸,后片更短,不需要袖子,只在肩下本应连接袖子处缝一条松紧带,勒住胳膊,就可以端正地穿在身上,只有领子像真的那样完美,花褶领、一字领、圆领、尖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缝在只相当于真正衬衫八分之一的小布片上。

在几乎人人都已穿上五颜六色假领子的时候,我却还没有一个那样的假领子。因为那得自己做,而对于我来说,把领子平整地安在剪成圆弧的布片上太难了。记得贵银问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假领子,我只好回答我不会做。贵银说:“别人都能学会,怎么就你不会?我教你。”于是在她的鼓励下,我去服务社买了一尺花布(记得付钱也得付布票的)。花布幅宽三尺,洁白的底色上有一小簇一小簇西红色、天蓝色的碎花朵,星星点点,惹人喜爱。我借了剪刀去请教贵银,她拿过花布,嗔怪地说:“你这笨人哪,干脆我就帮你做得了。”我盼的正是这句话,

¹杨继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2 年 10 月 21 日。

连忙连声道谢。

正是冬闲时节，吃过晚饭我就钻进被窝看书。枕头垫得舒舒服服，土炉子里添好了煤，劈劈啪啪地响，书举在眼前，闻得到书页的气味。贵银盘腿坐在我对面她的铺位上，一针一线地缝着我买的花布，那小东西在她手里渐渐地成形。灯光有些昏暗，她专注地微低着头，身后的墙壁黑糊糊的。她的身影覆盖在我身上，像一层温暖一层安全。我的思绪忽然缥缈，在这遥远的边地，在这土坯房子里，她怎么会像母亲似地照顾我？她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千里之外，我的家……渐渐地，我睡意朦胧，只感觉到她穿针引线的动作，一扬，一落，一扬，一落……

翌年回北京探亲，我外衣里边穿着贵银给我缝的假领子去了她的家。她住在永定门大街，房子临街。那次我看到了她的家境。原先我只知道她的妹妹小玉从小患糖尿病，要靠胰岛素维持，可从没想象出“从小就患糖尿病”的人是什么样子。那次我看见了小玉，她已经十八岁了，看起来却像七八岁的小孩那么矮小，枯瘦的小脸又黄又白，胸骨刺眼地耸着，我蓦然一惊。她家屋子里一条长长的通铺占去大部分面积，她的爸爸妈妈、三个弟弟和有病的小玉，都睡那条通铺。

七十年代末我们都“病退”回了北京，到1986年，我离开兵团已是第九年。由于想念贵银，我又去过她的家。她已经不住在那里，房子变成临街的铺面，做生意的邻居说不出贵银一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问起小玉，邻居说，那可怜的病姑娘不一定在世了……

2008年知青的聚会很多，许多知青续上了联络，我也又见到了贵银。她讲述了她的“病退”回北京以后的经历。简单地说，她在一家区级小纺织厂做工，仍然很是劳累，在兵团落下的风湿病发作时曾有两年卧床，小玉1983年病故后全家才从沉重的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可是弟弟们都已成人，要结婚，要住房，在母亲的催促之下，不容有更从容的选择，她草草地结了婚，幸而丈夫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有共同语言。可是90年代丈夫的工龄被“买断”，贵银的厂子也“黄了”，提前退休……

叙旧中，我说：“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给我做的那个假领子，我不穿了以后还留了好多年。每次看见你的针脚，像机器扎的那么整齐密实，我就想起你。”

听了这动感情的话，贵银轻轻地说：“你不忘别人帮了你，知道感恩。我也记得那个假领子，我……”像有难言之隐，她忽然停住了，吃力地说，“你这样的人，想象不到我那时候有多穷、多难。你大大咧咧，什么都不注意。我一直没有褥子，铺的是1969年带去的一条棉絮。冬天我也没有棉鞋，就穿个高腰的球鞋。”

曾在一个宿舍住，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实在难过！贵银却很平静：“你们都

觉得那点津贴费少，五块七毛五少，六块七毛五少，七块七毛五少。可是我，只有那个卫生费毛票七毛五是自己的，成块的钱都得寄回家。三年后咱们改成挣工资，对我也是一样，除了留下饭钱，钱都要寄回家。小玉得靠药活着，家里三天两头和我要钱，我真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给你做假领子，知道你不会和我要那些剪下的碎布，那就是我的私心。我那时候正在攒碎布头儿，想给那条棉絮拼个褥子面儿……”



我惊呆了。贵银对假领子的叙述使我泪流满面！

那次和她见面以后我自做了一个假领子的纸模型（见右图），并写了这个故事。

半成品枕套的故事

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商店里曾经畅销过半成品的枕套了。这也是那个年年在社论里宣称“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时代的一大特色。

1973年我在内蒙古边疆时母亲去世了。再回北京休“探亲假”时，一位知青朋友的妈妈赵伯母不但接济我的生活，还注意到我有学习刺绣的愿望。有一次，她说，“你不是想学着做补花吗？我找出专用的布料了。”她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包袱。我一看，里边都是些五颜六色的小布头，像是粗布，皱皱巴巴地团着，一点都不漂亮，这怎么就能做补花呢？

赵伯母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说：“看着皱巴，但不要紧，画好图样后剪下来熨烫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当即在她家的图书中选中了一批可爱的动物卡通做图样。赵伯母指导我把图样拓在了小布头上，然后剪下来一片一片地熨烫。一个个动物形状的小布片变得平平展展，就像一片片好看的书签。

那已是1976年。在北京百货大楼里有个专门柜台，出售的确良枕套的半成品：一对半成品枕套由两个枕套面、四块背面布和两卷做边的布条组成，价格非常便宜。那时成品枕套远不如这种半成品枕套受欢迎。人们的收入实在太低，知青的收入更低，所以廉价的半成品枕套十分畅销，都愿意买回来自己加工——这样可以省一些钱。

我就是带着把在赵伯母家做成的小布片缝补到枕套上的急切心愿去百货大

楼采购半成品的，买到后心里好高兴。

买好了半成品，我便把布片贴了上去，反复端详，感觉不错。我把这些半成品卷好，带回了兵团，准备闲暇时做一点女红，使这些半成品经自己的手变为成品。

回到兵团，一天我正在绣枕套的时候，领袖死了。

高音喇叭广播这一消息时我有些懵懂，还在宿舍里继续飞针走线。于是，有



人一把夺下我的花绷子，对我大喝一声：“都什么时候啊，你还补花！”

哀乐声中我猛然领悟到，如果不能速作悲痛状反应，众目睽睽之下是非常危险的。我赶紧停了手。

等我把这些半成品完全做成了成品的时候，生活已经悄悄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上图：我在赵伯母指导下补花完成的枕套。生活几经变化，许多旧物件都已经消失或扔掉了，这留有特殊时代印记的枕套我还保存着。）

电表

文革刚结束时的八十年代初，电表在北京突然成为紧俏商品。究其原因，竟与道德有关。

文革结束后，人们刚刚开始正常生活，收入都很低，于是就有人耍小聪明“偷电”。一度电本来价格8分，但是集体电表计出的费用除以用户数量时，每户的一度电费却总会远远高于八分钱。该怎么对付呢？只能分立自己的电表，坚持只承认自己用电的度数并按照官方定价付费。这一来，家家都安装分表，市场上电表也就紧俏起来，一时间简直就买不到。

那时候胡耀邦当政，“落实政策”是真的落实。东华门房管所无法归还文革时我家被占据的房子，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给我父亲新的住房。几经努力，被占据的房子无望腾退，便另给出了灵境胡同的两间平房替代。父亲用这处平房解决了我回京无处居住的难题。本来，只需要向前住户付费五元我就可以“继承”那里的电表，可是当时我的工资才三十多元，付出五元，着实不舍。我想到父亲也刚刚搬家，他拆下了一个旧电表，就马上打电话向他要这个电表。父亲说

拆下的电表还在，答应马上找出来给我。很快，他把电表送到了宣武门地铁站交给了我。

我拿到了电表，没想到安装中却困难重重，麻烦多多。我这才后悔了，前住户要五元可真的是不多。假如接收下他那个电表，会节省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啊！

后来再次搬家时，已经不再需要继续使用父亲的电表，但我一直没有把它扔掉。这个电表关乎从“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转换时的观念变化及收入、市场情况，又关乎一段关于房子“落实政策”的经历，它使我忆起父亲，他在那一阶段“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中恢复了工作，分到了住房，心情似乎好得多了。

2020年3月28日北京

【故纸堆】

青岛市 1970 年的絮棉供应

齐晋华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不但棉布而且棉花（一些地方称絮棉）都要由政府凭票定量供应的生活。那时候冬季没有如今的羽绒服、防寒服，更别说什么“皮草”了（这些名称当时都闻所未闻），一般人过冬只能靠棉袄，缝制棉袄不但要用布票，而且要用棉花（或絮棉）票。如果还要添制棉被，这一年才供应几两的棉花怎么安排？所以那时的衣服不得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棉被也不得不将用了多年（甚至用了两三代人）的旧棉絮交走街串巷的弹花匠弹制翻新后再使用。现在弹花匠这一行业在许多地方都已成为比大熊猫更难找到的“珍稀物种”，而这棉花（絮棉）凭票定量供应的往事也早已被人们遗忘。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文件

青革生指（69）第 171 号



最高指示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节约闹革命。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要准备打仗。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关于安排一九七〇年絮棉供应的通知

各级革委、各军管会：

根据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财办“关于下达一九七〇年度絮棉供应的通知”精神，现将我市一九七〇年民用絮棉供应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九七〇年度絮棉供应仍实行“基本定量加补助”的分配办法，每人基本定量六市两，凭絮棉票供应（絮棉票只能在本市和崂山县通用）。崂山县生产队生产的棉花，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低于六市两的，由国家供应其不足部分，达到定量标准的不再供应。

二、困难补助，主要用于补助个别衣着困难的职工、贫下中农、劳动居民和沿海渔民等。具体要求仍按一九六九年度的规定执行：

（1）凡户口在街道的职工、干部、居民等，由各区革委本着照顾重点从严掌握的精神进行补助，不要平均分配。

（2）凡户口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的职工、干部衣着确有困难的，由本单位出具证明一次到棉麻站审批领取絮棉补助票。

（3）对职工、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分配到寒冷地带的大、专学校毕业生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可由批准单位出具证明到棉麻站办理。

（4）对学生、城市居民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由各区革委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办理。

三、生育用棉，即第一、二胎的新生婴儿，每人供应一市斤。凭出生证明和户口簿到所在管区革委会领取购棉证明。

四、絮棉供应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生活的一件大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宣传教育和絮棉票证的发放工作。商业部门，要认真安排货源，保障供应。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已发：各级革委、各军管会。

（共印一三〇〇份）

【书海泛舟】

文革时期北京市民生活片断

(《回炉——我的社会大学》选读)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正式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第五回(全书稿共约34万字)，本刊此前曾在第122期摘登了该书稿中的《从狂热到疑惑》，在第123期摘登了该书稿中的《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作者简介详见122期。现标题为本刊另拟。

(北京街头)汽车和自行车也不多。街道很窄，被两边的房子挤得还没有两车道宽……那时买一辆天津产的“红旗”、“飞鸽”，或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得花100多块钱。一般工人不知道节衣缩食多久，才能买得起；而且，直到1978年我出狱后，自行车还凭票供应。单位里好不容易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还得群众评议，选出急需者，再“抓阄”。谁要是有一辆“凤头”，简直如现在拥有“奔驰”、“宝马”一样出人头地。我出狱后，费了好大劲，托年轻狱友回族人小王，搞到一张自行车票，才买了“一头不吃草的驴”。

市面很萧条。入冬前，居民就把“主打菜”——白菜、土豆、萝卜，囤积起来。北风那个一吹，雪花那个一飘，蔬菜商店里就难见绿色了。直到八十年代初过春节时，北京市蔬菜公司才大老远地从南方进一些蒜苗、黄瓜、柿子椒之类的鲜菜，品种少，数量少，价格高，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一斤曾卖到28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想尝鲜儿的市民，得起大早排大队“抢购”。给亲戚朋友拜年，送点儿“绿菜”比现如今送鲜花都时尚。

粮食、副食品凭证凭票供应。北京市民中的家庭妇女、家庭夫男，每月粮食定量26斤左右。工人根据不同工种，定量从30斤到60斤不等。生了孩子赶紧报户口，同时就有了“粮食供应关系”，每月四斤；之后每隔几年得到粮食供应部门办一次“增供”手续，从每月8斤、12斤、18斤……直到上中学增加到30斤。我在老家上中学时，每月粮食定量为36斤。参军后，在营房里工作、训练，每月45斤，到野外拉练、演习为60斤；而据老兵们叨咕，“三年困难时期”部队节衣缩

食支援地方百姓，每天只喝两顿高粱米稀饭，那饭稀得能照出人影儿。到了北京，我在机关时，粮食定量为每月32.5斤。按现在的水平，许多人一个月吃到肚子里的粮食根本没有这么多。那会儿不行，人们肚子里普遍缺油水儿，粮食不够吃。亲朋之间偶尔赠送几斤粮票，就是相当贵重的“礼品”了。我和妻子“搞对象”时，她每月都给我补贴几斤粮票。我把这看作“爱情的象征”。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开始“闹油”了，我们家也和许多市民一样，常用粮票换鸡蛋、塑料盆桶等东西了。

八十年代初以前，市民每户每月三斤鸡蛋，一斤白糖，几块豆腐及二三两的粉丝、麻酱、淀粉等。也许正因为这样，侯耀文和赵丽蓉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英雄的母亲》中，才有英雄母亲着急去买豆腐的情节。每到月头上，各家都赶紧拿着“副食本”到副食店去，把那点儿少得可怜的东西买回来。发工资后，拿着“粮食本”、粮票，到粮店去买当月的口粮。我成家以后，每天晚上下班回家，顺便到副食店买两三毛钱的“肥瘦肉”，“炼油”炒菜——这么“零揪”，可以不用“肉票”，又省了豆油或菜籽油。每年配发给市民的“布票”，也就够做一身儿衣服的。谁没事儿还有心思逛商店啊！再说，那会儿北京南城一带，就没有几家大商场。

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处于近水楼台的商贸、服务工作，成为大众艳羡的职业，从业人员中既有王府井百货大楼张秉贵那样的劳动模范，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凶神恶煞”。服务员、售货员身为“工农兵”，乃是顾客的“上帝”。顾客得用热脸去贴他们的凉屁股。“宾至如归”这一成语在当时的含意是：顾客到了招待所、餐馆，要自己动手清理房间，打饭刷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因而，有些餐馆干脆就叫“大众食堂”、“工农兵餐厅”。

我在狱中时听几个同号讲的“故事”，尤其令人“发指”：北京某区商业、服务业系统搞卫生大检查。某小吃店的环境卫生工作，好得简直无可挑剔。正当检查团大多数成员交口称赞时，一位团员发现操作间门后角落，地上扣着两个白瓷蓝边大碗，掀开一看，碗里是一堆干透了的大便。肇事的服务员被揪出来了。他交待，值夜班时还把大便搅拌到了油炸糕的豆馅里，每次蹬平板三轮儿外出采购，都让弟弟在半路候着，从车上往家搬鸡蛋、食油、白糖……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那家小吃店只好关门大吉。同号小邢的亲身经历，令人“艳羡”。他面相英俊，十五六岁时，经常凭“副食本”去副食店买东西。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售货员对他特照顾，要么不看本儿，要么多给他。混熟之后，小邢总是甜甜地叫“姐姐”。终于有一天，姐姐对弟弟说：“明天姐姐轮休，带你去北海。”在北海公园的一个僻静处，姐姐耐心地教弟弟亲嘴儿，摸奶子……直到闭园，姐弟俩才分手。这种亲密的姐弟情，一直保持到小邢二十多岁进班房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冬天，市民多用煤球、蜂窝煤炉子取暖。燃煤也定量供应。看守所所在的北京“南城”，楼房寥寥无几。胡同里，一片片灰砖或红砖平房，挤挤擦擦，飘出缕缕呛人的煤烟。“我们”看守所用的暖气，对大多数市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物件”。我越看越想，越觉得老白说的有道理，“里边”比“外边”好，犯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一般市民，“既来之，则安之”吧！

【书海泛舟】

这才知道什么叫老百姓的生活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选读）

毛 毛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不是在邓小平女儿的书中看到，一般人很难想到毛泽东时代堪称“天子脚下”的中南海职工和家属，居然会住在“破旧而简陋”的环境里，而且“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甚至“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可惜在正式出版的有关回忆中，类似这样涉及当时民生状况的记述实在太少。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

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

【书海泛舟】

难民跑城

（《牺牲者》选读）

赵 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著名作家赵瑜在2007年即已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系列之7，这部分主要记叙了文革前期晋东南两派对立、武斗时期县城里百姓的艰难生存境况。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因属“敏感”题材，至今未能正式出版。本刊此前已在第22期（2013年9月30日）摘登了该书稿中的《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在第25期（2013年11月30日）

摘登了《是谁杀了王尚志》，在第31期（2014年3月30日）摘登了《虐杀生命》，在第72期（2016年6月30日）摘登了《山西文革中的几份死难者名单》，在第149期（2020年3月30日）摘登了《处决在战场之外》。

把棺材抬上卡车

1967年冬季，大雪覆盖了太行田野，上党盆地。

白皑皑沟壑间，随处可见淋漓血。太阳升起来照晒城乡，到晚夕时候，那鲜血演变成紫黑色。于是，长治古城街道上和郊外大路旁，形成了人烟稀少、万物荒疏的怪异景色。长江两湖那边，云南广西那边，四川盆地那边，东北山林那边，景色应是相似的。黑紫处，是百姓的尸身，是文革健儿曾经的热血。

晋东南两大派，一派称联字号，一派称红字号，水火不容，武斗形势恶变。我的少年生活进入了一个真正战乱的年代。

地区干部们的学习班也停办了。我罕见的父亲惶惶然回到了家中。他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替人收尸，在地委机关和家属大院之间奔走丧事。怪异处还有，他居然脱却那件很破很破的干部服，从箱中翻出了一件早年在察哈尔军区时的浅黄色军官上衣，默默地穿了起来，并且把铜质领钩系好，借此表明他曾经有过的军队身份。干部们自有其政坛风云穿着时尚，我当时并不明白父亲的真切含意，那是文革中军人政治在成年人身上的演变。穿上这军装，不过是自我意识里的保护色，好像在说，军方支持联字号，咱们的审美观念不差甚！

现在收尸，我父亲仍然穿着带有人字布纹的浅黄色军装，忙里忙外。我发现他的嘴角居然挂着一丝残酷冷笑——这是一桩在他来说万分侥幸的事件。

死者名叫董振义，是父亲在地委学习班的同期学员，也是地委宣传部的中层干部。读者有所不知，文革前，省委和地委中层干部，都比较牛气，他们并不希望并不羡慕在各县市担当县委书记或县长，而是情愿留在城市机关里。与今日相反，拼死力气的人，运气不好的人，才到县市去担当县委书记或县长哩。只因为凡是从地委、专署下去的干部，全家户口要下去；还要相应减少全家的口粮以及细粮的比例，又必须完成干部参加农村劳动的工作日，这意味着一年四季都要干活，仿佛你早年革命一场，换来的不是全家安定，而是继续在第一线苦劳。这与今日之贪腐情景完全不同——老地委和行署的处长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安慰那时的黑瘦型县委书记：回来了？真辛苦啦！快到澡堂洗洗吧。

死者董振义身矮微胖，也是地委机关的一位中层干部。

董振义叔叔在文革中先是老老实实住“牛棚”。我曾经去过一次水车沟地委学习班，是我妈嘱咐我把些衣物给我爸送去。步行半小时，在长治市东郊某处，

一个巨大房间，中门分左右两扇打开，但见正面一溜浩瀚通铺，可睡二十人以上。我父亲和董振义等叔叔伯伯们整齐地盘腿端坐铺上，正在学习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或者马恩《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我同学李长武他爸被重用了一下，竟然独自站立通铺下，以严肃的姿态正色领学。我悄然而入的时候，我爸从铺上欲起而未起，眼中透着短暂的欣喜与更多的无奈。我一眼便看到了他的位置，说了“给你衣服”之类简短几个字，长武他爸和我爸以及董振义等面容熟悉的“走资派”统统静默无语。我似乎听到我爸对长武他爸巴结的话：“这孩子跟长武可好哩！”我在全体静默中转身退了出来。

他们衣着极破烂，面色苍黄极憔悴，使我深感担心：我爸是不是快不行了？

待到我独自步行返回地委时，街头尽是揪斗更大干部的场面，这又使我感到了自家的“幸运”。

就是这位身材矮胖的董振义叔叔，现在被人活活打死了。

我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回顾这件可怕的事：

当时，新生的地区革委会呈现瘫痪状态，红字号拥戴的某某主要领导住到海军驻地了，而支持联字号的军分区根本不吃海军那一套。省府刘格平支持红字号在晋东南的主要领导者，指示他要克服软弱，要召开十万人大会，搞什么两派大联合，又必须让我们学习班的地委干部出一个代表，到大会上公开讲话，表态刘格平正确对待了干部，支持红字号当权。开始让那个谁谁去，人家说病得厉害，快死了去不了，又说让我去，我坚持不去，好家伙，拖着我上车去英雄台广场讲话啊，干这个哪敢去？我说我腰坏了，实在讲不了，真不敢去讲啊！我估计了，谁公开讲话，对立派就会要谁的命，因为夺权后的两派矛盾并没有解决嘛。人家拉啊拖啊，非拖着我去英雄台表态不可，把我衣服上的扣子都拖光了，还说我有儿代表性！我坚持不去，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选中了董振义，老董被人家连劝带架，就上了十万人大会。他这厢一走，我们在水车沟学习班都害了怕，怕他好去难回呢。结果，当天老董在英雄台讲话了，代表地直中层干部，支持某某为首的地革委执政。晚饭时候等老董，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们大伙儿在通铺上躺着，黑着灯，不敢大声交流，等到后半夜，老董还是没回来，大家都知道，肯定出事了。

父亲回忆此事，至今带有文革中长治城乡那种恐怖神态。那一天，董振义叔叔到英雄广场去，在台上讲了一段话，红字号万众报以热烈掌声。讲完下台，无人护送，董叔叔也就消失不见了。

几天后，人们在长治市东门外野地里，发现了一个死尸麻袋——董振义被对

立派活活打死后，抛尸荒野：地委专署的中层干部们，你们还要支持刘格平和他在晋东南的代理人吗？你们还敢充当红字号吗？

当时，我老爸稍有不慎如若应允，这死尸麻袋里，装的就是他。

现在，战火复燃，我父亲一干“牛鬼蛇神”，返回家来，为董振义等人收尸送葬。战斗频繁中，学习班实在办不下去了。

提起地委大楼里的干部们，生生死死，有个说头。

地委联字号干部组织，最早的头头是农工部干事，名叫史效芳。史效芳带头造反，显露一时。不料想，半年多之后，史效芳等四人驾吉普车，赴省城为本派事业而奔走，招来了红字号对史效芳等人的满腔怨恨。

不幸的是，史效芳等四人在太原活动事毕，急急赶回长治。山高水远，道路崎岖，在途经一处火车道口时，司机急躁，致使吉普车与疾驶而来的火车发生碰撞，咣当一声巨响，车内四位联字号干部当即血肉冲天，死于非命，造成地直机关联字号集团的重大损失。时间是1967年9月24日。

群众派战中任何一件意外事故，都将转化成怪异无比的斗争说法。于是，红字号的标语口号出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汽车撞火车！”还有“深切悼念不怕牺牲敢撞火车的壮士史效芳”等等，这标语严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幸灾乐祸，把一派的快乐，建立在另一派痛苦之上。

联字号战友把史效芳等人遗体收回长治，举行追悼活动，又派遣专车，由35岁的司机李贵昌驾驶，前往史效芳老家送葬。因担心红字号袭击，特地为李贵昌配备了五颗手榴弹自卫。不慎之中，手榴弹竟在车中爆炸，司机李贵昌当场死亡。这真是恶性连环戏，悲苦连天。红字号迅即站在平民司机李贵昌立场上，要“讨还联字号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政权斗争思维方式不可名状。

种种莫名命案，让人无法言述。所以，一部由前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主编的《当代山西史》称：文化大革命，山西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998人，并注明不含武斗死亡人数在内。我觉得死了两万人，仍是保守数字。许许多多生命的流逝，竟不知该如何统计才好。这一回算不算“非正常死亡”？以上史效芳、李贵昌等五人之死，算进19998人当中了没有？

此类不明性质无辜死亡者，在全国文革中数不胜数。

董振义叔叔，确是被一派打手给生生弄死了……

打发停当董振义叔叔之后，我父亲一班人，又开始为庞志忠伯伯送葬。

庞志忠伯伯也是地委宣传部一位中层干部。文革之初，他和地委宣传部长杨俊峰一起，遭到批斗连连，身心俱残，一朝大病不起，日夜心神不宁。早不该晚

不该，庞伯伯偏偏咽气在两派战火重燃的当口。兵荒马乱，谁管？

送葬庞志忠伯伯，情况更为繁复。

造反派只顾打派仗，肯定不管，尸体直板板躺在家中。

庞志忠伯伯和我家住在同一所四合院，我家居东头，他家住西边。西边传来哭声，东边日夜相闻。

我父亲一班老地委干部，那一班历经多次批斗业已半死不活的中小型当权派，那一班不敢挺身搅水且自家难保的同僚们，默默地走到了一起。他们试探性地向对方说：老庞的事，这可咋办啊？唉，老庞没有参加红字号也没有参加联字号嘛！

他们那点人性良知，通常叫做人的良心，尚且残存着。

火葬，当年的长治没有条件。

庞志忠老伯的归宿，只能是他那故乡：晋城县北部大阳镇。而一路上，必要途经长治县、长子县、高平县、晋城县等多处两派武装关卡，人心惶惶，往返二百多公里，能走得成吗？

印象中，这班地委干部商议了半宿。

我父亲和另外四位干部，身单体弱，奋力把棺材抬上一台破旧卡车，冒险驶出长治，向南而去。这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情景是：关卡林立，武装封锁；逃难百姓，扶老携幼；冷枪阵阵，路有毙尸。

两派作战日甚一日，长治城里市民们，凡有逃奔乡间可能性者，无不弃舍而逃，暂避刀枪，到乡下去，到老家去，到外地去，投亲靠友去。火车汽车均已危险，备遭袭击，所以，驾平车的，推自行车的，步行的……叹我芸芸众生，凄凉满路。

这辆破旧卡车，也是地委车队师傅们，动了感情受了感染，下定了决心，才冒险开出来的。

出长治界不远，刚到长治县南呈地面，关卡鸣枪截车，上来一批武装分子，棺材盖子当场被撬开，检查讯问不停，不管哪路神仙，反正要问：什么人？什么观点？时间常常有客过路，问观点，过客先是瞎猜，猜对方是哪派的，便说成咱是哪派的，猜对了，侥幸开路，猜错了，肯定倒霉，非打即骂，搜身掠货。我父亲等人应对说，“我们过去是地委干部，现在是走资派，送病号尸体，暂时不敢有观点”。

武装战士厉声喝问：“放你妈的狗屁，没有观点？干革命没有观点你还活屁甚哩！”

我老爸回忆说，最稳妥的回答是：俺们不算革命人，哪一派都不稀罕，所以都不在革命组织，所以不敢有观点，所以也还说得过去。

为什么要开棺验尸？是因为两派频频得报，对方多用棺材车或粪肥车或油罐车或煤炭车或垃圾车或军用车，千方百计，往来运送枪支弹药，所以必须开棺验看。

这一关总算过去。

车过长子县，进入高平界，尤其是风险地段。众干部们再不愿意停车查验，待天黑时如果到不了大阳镇，那就果真危险难测了。有趣的是，这五名地委干部，正值中年，他们年轻时候，也很不含糊，谁都经历过战争岁月，所以，当高平公路两侧又一次响起枪声，子弹嗖嗖从卡车上掠过时，他们反而很镇定，指挥司机万万不可停留，冲过去，坚决冲过去！

卡车和棺材一起颠簸，活人与逝者共同前进，众干部匍匐在车厢里。司机加大油门，冒险冲过了高平县境。枪弹落在身后。众干部议论说，有几枪还是鬼子“三八大盖”，不过有几枪，声音不熟，说不清是79步枪还是什么枪。

当日抵达晋城大阳。这是一座古镇，以优质生铁和全国闻名的钢针著称，镇内有宝塔名胜。我爸等人卸下棺材，告别乡亲，并不敢久留，只让司机夹带了些窝头干粮，耐着饥渴，急急掉头返回。长治家里头，老婆孩子，安危难卜，多少事情等着他们呐。

越怕出甚事，甚事偏要来。当卡车返程到晋城巴公镇附近时，一个岔路口，众干部再次被武装拦截下来。大木头桩横在路中央，他们实在跑不脱了。

一阵厉声质问，一阵含糊回答。

棺材却已经不在车上，人家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解释。我父亲他们反倒怀念起老庞伯伯的棺材来，那毕竟算个实证呢。

众干部被喝令下车，照例小绿豆绳子捆了。卡车被人家开上，一路押解到晋城县城大据点内。乌黑枪口始终对准了他们花白头颅。什么观点什么号，谁也不敢乱编，编对了还好，编不对头，必倒大霉。干部们以沉稳持重态度，拯救自己于一时。

当晚，在岗哨林立大院深处，房内地上一把草，我父亲他们倒地而卧。腹中饥渴，幸生命尚存。老爸枕着一块半头砖躺下，低声玩笑：伙计们，先把我打倒吧。

后半夜彻寒，他们这才悄悄聚拢开小会，低声分析局势，看看能不能判断出这支武装人马之隶属关系。

天快亮时，终于得出结论：从各种迹象分辨，这伙人应属于联字号晋城“地二八”人马。这分辨这结论无比重要，分辨错了，对策失误，满盘全输，轻则长期关押回不了长治，重则丢掉性命。至于挨打，更是无可躲避。

晋城县在夺权后，原老干部李德全，是联字号一派推举的新领导。李德全从

地委来晋城时间不算长，我父亲这几位俘虏，与李是熟识的。于是，他们做出分析决断，冒险给李德全写下条子，说明身处困境需要营救，并在清晨喊“报告”，要求哨兵转信李处。

这判断要是错了，一切全完。

哨兵喝斥：“干什么！”他们并不敢贸然行事，而是用言语再探虚实，观察人家是何反应，根据反应，证实判断，这才敢把字条递上。结果是，提到李德全名字时，那看守反应温和，并未骂街，俘虏们便硬朗起来：“去，叫老李来一趟！”哨兵一怔，接了条子，不敢怠慢，转送出去了。

半日后，有人前来二度审问，态度和缓。验明正身，开锁放人。来人向我父亲他们解释道：李德全主任说委屈你们了，这几天有长治情报告知，红学号老贼某某，近日派遣几名地委亲信干部，来晋城串连活动，其中一个叫申金有，一个叫张天才，与诸位当中的两位姓名相似，所以误会了，实在对不起，赶紧开车赶路吧，高平红字号路卡很厉害，可要小心云云。

同行者中，确有一位名叫申双鱼的叔叔，而不是申金有。同系地委干部，同姓申，便出了麻烦。

我父亲等人仓惶而归。总算有惊无险，四肢完好。虽说蹲了一夜土班房，反正他们长期蹲“牛棚”，对此类事，也能消受得了。

全城大逃亡

冬天来了，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

我们这伙少年人失学一年多，现在甬提学校复课，连老师们也逃光了。银行里两派公开斗法，金融系统就运转不起来，晋东南全区所有的工厂都不冒烟。地处长治东街的水厂被联字号炸了以后，全城断水，人渴极了，只好推开多年尘封石井盖儿，求助于清末民初乃至更古老的水井。长治电厂革委会主任让红字号给打死了，那里不仅不能发电，还变成了一座武斗据点，人们不得不重新启用了古旧的油灯盏，马灯或蜡烛成为高级照明物，要省着用。政府报纸早已停止印刷，联字号报纸《太行红卫兵》和红字号报纸《万山红遍》也都断了档，广播电台被联字号武装占据，家里收音机既无电又无波，连噪音都发不出来。邮电局则被红字号统领，邮路断绝，各种国防战备报话通讯器材成为红字号指挥部系列用品。晋东南交通运输枢纽——长治汽车运输公司，先是被联字号占领，后被红字号反攻夺回，通往山外的长途客运和货运全盘停顿，火车虽是联字号专利，但铁路却多次被红字号炸断，造成客车掉道脱轨。老地委那座苏式五层大楼，当然没有干部办公，海军和红字号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占领大楼后，同时占领对面地

区宾馆和西北面招待所，把这一区域变成了红字号一座战区指挥所，并且与附近地区建筑公司连成一片，挖通了作战地道。

全城时时戒严，实行宵禁。

我看到街上出现乱枪射毙的无名尸体，与一辆破旧自行车一起，横躺在马路正中间。无人来收，数日后又和马路冻成了一体冰丘。白雪覆盖了他，化开了再覆盖。实际地点：长治南街东华门大马路正中央。

上党古城，成为地地道道的“一片孤城万仞山”了。

一座不再呼吸的庞大死城，到晚间黑洞洞，阴森森。枪炮声此起彼伏。

粮食成为极大问题，生存突现险恶危机。

白天太阳升起时候，去留未决的市民们抓紧出门来，东扎一堆西聚一伙，一边打探种种消息，一边遍寻蜡烛煤油，屯集粮草。有啥算啥吧。善良无助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既胆小又坚韧的妇女们，要通过快速分析种种信息，来决策自家人近日动作走向，是留还是逃？

这场大革命，闹了不足两年时光，就把一个工业化的发展中城市，大踏步地拉回了远古时代。人们淘井取水，钻木取火，以牛马或步履为交通，以口耳或鸡毛为传讯，以家族为社会单元，以物易物来交换，生命安全成为第一需求。大革命首先革毁了民族文明进程。

善良无助的母亲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是：昨晚某街某户，从屋顶窜进来一发炮弹，全家六口人正在睡觉，全都炸死，一个不留。

千家万户把玻璃窗户用纸条糊成米字型，防止炮弹震碎玻璃伤及老小。接下来夜夜枪炮不断，纸条糊玻璃已无意义，人们便四出寻找砖头，把窗户严严实实垒起来，苟活在黑乎乎的家中，此情此景随处可见。晚上睡觉时，人们从床板上头转移到床板下头，万一房子炸塌了，也许床板还能抵挡砖石。

我家亦如是。我父亲从水车沟学习班活着回来，拆了煤池，用砖头垒窗户。他还特地在垒死的窗户上留了两块活砖，以便于在室内踩着凳子，随时把活砖抽出来，伸直脖子瞭望院内动态。每次观察完毕，他都会慎重地把活砖堵好，然后坐在墙下，背朝枪炮世界，轻声和我妈妈分析一番局势。最后叮嘱我：从明天起，你小子无论如何不敢再出去玩了，他们只会越打越厉害，很可能白天都会打！

我父亲何以做出如此悲观的分析？——紧张局势已经非常明白，只是我等少年人不知危险罢了。红字号、联字号结成了仇敌，进入1968年春，双方只能求助战争解决问题，军事冲突日益升级是必然的。

请看一位当年的老红卫兵、太行中学红字号头头程先生写的一段回忆。他描写了1968年元月长治古城大战之初的情景：

这时的两派组织，早已抛弃了原始武器，改用为正规的、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冲锋枪、火箭筒、加农炮。双方抓紧备战，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紧握枪。……白天一大早，两派高音喇叭就开始歇斯底里的攻击对骂，噪音不绝。一到下午四时，双方又开始声嘶力竭地、一遍遍地吼叫“戒严令”。尽管所有的喇叭都架设在几十米高杆上或烟囱上，直冲云霄，仍免不了被枪弹打得百孔千疮。联字号“总司”的喇叭看起来高耸于地委党校，其实播音员却躲在西部由军人守卫的老监狱里，远距离广播。市面上，这里商店被抢，那里房屋倒塌，到处垃圾遍地，家家户户把窗子堵严了。各主要街道路口，或者布满了拉上弦的炸弹、手榴弹、地雷，或者干脆堵上几辆翻倒的破旧卡车、拖拉机。进入夜晚，漆黑一团，许多百姓都睡在床铺底下，憋闷潮湿，黑灯瞎火。但听枪炮声，不闻人欢笑，惶恐不安，久久不能入梦。虽然人人都小心谨慎，注意防范，到第二天，仍不断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开。一首当时的民谣说，“有街门的关街门，没街门的插圪针，有妻儿的顾妻儿，没妻儿的顾个人”！人们如同听说“鬼子进村”一般恐慌不安，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今日生不知明日死的悲惨日子。一月二日，联字号某组织攻占市自来水厂，造成全市停水……后来《长治市地方志》有材料写了，“从1967年12月15起，长治运输公司发往各地的客货车被迫停开；16日市内交通中断；25日银行停止营业；27日煤炭停止供应。次年元月2日，全市停水停电；6日，长治通往各地的长途电话中断；接着火车停开，航班停止运营；所有厂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一个年产90万吨煤的矿井被淹，井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是那年那月长治古城的真实惨景。我注意到程先生和长治史志，都没有写到全市粮店停供这一细节，这是更可怕的啊。

全城大逃亡终于开始了。

我们这所四方院子，有军分区三四家军官与地委六七家干部共同居住。当时，院内所住军分区家属，都已经搬入分区大院躲避，军分区最重要的一名老驾驶员何师傅，也把全家送回了县乡，何师傅日日夜夜奔驰在联字号抗敌第一线。院内还有防空办韩主任、高平县主要领导、晋东南报社主编、行署水利局局长等几家人，都是晋东南本地干部，统统逃回了故乡村落——偏僻的太行山区某县某乡。人们垒窗户、钉门子，把生命鲜活的母鸡锁在屋内，把粮食乱撒在地上，以便让鸡们慢慢啄食。

全院里只剩了我们一家外省籍人。交通断绝，晋冀遥遥，回不去了。咱家成分高，我父亲出来工作早，我奶奶已被驱逐返乡，全家担心回到河北省衡水专区安平县张舍村以后，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在交通尚有一线希望时，我爸我

妈并没有急于逃奔。他们难啊，怕啊，他们举棋不定，前思后想，一不留神已过1968年元旦，迟疑之间，现在想走也走不成了。

又是一场大雪。早晨我出来看时，大院里毫无生命信息，竟无人打扫各家门前路径。我怀抱一本从残败的图书馆捡来的《水浒传》，站在院中，好像伫立在苍茫雪原上，都市院落里，倒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

咱家跑不成，别人家都在跑，千家万户尽在逃难中。

晋东南前辈作家申双鱼先生，是和我父亲一道去冒险送葬庞志忠伯伯的干部之一。这位高度近视的申叔在文革回忆录中讲道：

进入1968年元月，“长治形势更严峻了。武斗更加激烈，天天听到枪炮声。东街一个卖豆腐的被炸死街头，文工团一位朋友在街上突然被炸伤了腿，都没人管。市内停水停电，银行关了门，粮站关了门。我们再也领不到工资和口粮了。在这里怎么生活？炮弹又在头顶上飞了一夜，听说是红字号由西招待所打医专校园的。那里驻扎着联字号核心组织红总司。

“我们无法在地委家属院住下去了，也决定回老家逃难。我们在家里垒门窗、藏东西。我带长子学勤用平车到体育场拉砖块，当我们拉着砖块走到西招待所时，突然西招墙外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们惊呆了，孩子被吓得趴在地上。等我们醒来时，看到西招待所腾起了一团烟雾，围墙被联字号炸塌了。侥幸没有伤到我们过路人，他们大白天就打了起来。

“急急忙忙回家后，我们用砖块把窗户垒死，把衣物藏到炕洞下。如同抗战时期坚壁清野一样，尽量把东西藏起来，防备我们逃难走后，别人搜抢东西。

“昨晚，又一阵剧烈的枪弹声，不知哪里发生了战斗。各种消息让人惊心动魄。长治还要大打下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下午，我同爱人急惶惶骑着自行车，奔逃回了潞城县最东边、与平顺县大山搭界的偏僻山庄。”

此为地委干部逃难一例，非常普通的一例。

我的同学何明、何星他们家，逃难十分艰辛。他们老爸何元堂，文革前是地委一位部长，夺权后与一批“老走资派”被关押在长治看守所内，还得了阑尾炎。武斗形势紧张起来，看守所也顾不上这批人了，没吃没喝没电没水更没有医疗条件，监狱只有负担风险。此刻，谁家逃难来要人，就给你家开监放人，免得死在里头麻烦。这一天，何家使了一辆手推平车，到看守所把当家人接出来，一家老小直接启程上路。他们要步行走向遥远的沁水县乡村老家去——那里也是作家赵树理的故乡，可惜赵树理没能躲过灾难，最终惨死在省城太原……。何家头一天出了长治南关，只走到长治县地面，花些钱票吃了干粮，在农家寄宿一晚，次日继续推车赶路。何星对我回忆说：“我爸躺在平车上，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咱家又是走资派，一路上最害怕的，就是晚上没人敢收留。天黑时好不容易叫开一

户农家，都要跟人家说一堆央求好话。”何星老妈平时脾气急躁刚强，这时候也只好哀声下气。全家人一路奔逃，整整走了五天。一所乡村医院救了他爸一条命。

我的老同学韩征天一家，也是推着平车，历时三日，把重病中的老父亲——作家韩文洲先生，一路推回陵川县的。

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先生，偏在此时辗转回乡探亲。他当时还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好不容易到达长治后，两派鏖战正酣。他无法搭车前往武乡县老家，长治又万万不可停留，于是，他迈动两条腿，向北，向二百多里以外的故乡走去。大道不安全，便向小路行，山重水复，关卡林立，他担惊受怕走了两天半，到家后睡了三天。一路上两派哨卡，已经很给北京学生面子了。他后来告诉我：走啊走啊，心事茫茫。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总想着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这场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父老乡亲们赞同这场运动吗？

一个广为人知的逃难故事是：一家老小五口人，逃出长治东关，一路向壶关县步行而去。走出长治十几里地，红字号兵工厂的远程大炮正在攻击那里的联字号东郊据点。这家人慌乱中蹲在路沟里，抱作一团。不幸的是，偏有一发炮弹打到了这家人中间，爆炸后血肉横飞，全家当场死尽，无一幸免。2004年，我在采访中查到了这份材料。真是飞来横祸，惨不忍睹。

前头讲长治有不少从北京、天津迁来的战备工厂，如五四三厂、粮机厂、省建长治分公司、太行锯条厂等。这些厂子，职工家属合一块，足有好几万人。他们当中，除少数战斗骨干武装据守工厂参加晋东南派战外，其余全部逃出长治。老的老小的小，这几万人的大逃亡更加艰难。我的老友李晓翔，操着天津口音讲述说：“我们全公司的人往哪里跑？只能往天津跑啊。当时，断了通往天津的任何班车和火车。大伙嘛办法没有，长治实在不能呆了，粮机厂一发炮弹呐，打进我们省建办公楼了，当场炸死一个。几千号职工家属，怎么跑呢，要么你全家抓紧挤火车到河南去，从新乡想办法转天津，你们家挤不上火车吧，好，那你就得往东，设法下太行山，先到河北邯郸，再搭车走。嘛？怎么下太行山？千奇百怪，嘛招儿都使了，结伴步行的，蹬自行车的，反正人急了，全家得保命不是？只要能走了就行。说厂里派卡车送，这种情况极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派车，害怕半道儿让另一派劫了，损失就更大了。只有一回派车送，拉的是头头们家属。我们家就是这么走的，我爸不是公司红字号黑高参嘛！当时咱小屁孩儿一个，一说上天津还挺高兴。没想到，这一家子一家子的，回了天津可不好活，亲戚家也难啊，怎么住？怎么吃？哪有那么多全国粮票？开始亲戚还很热情，后来都发愁了。家家户户遇到了大难题。到最后，大人们又纷纷带上全家，离开天津，闹哄哄去了太原。为嘛上太原？咱省建上级总部在太原，我们分公司的人回不了长治，你们总部管不管？这么着，好家伙，我们这批难民在太原占了一所中学，那时学

校里不开学嘛，成百上千的难民就困在中学里，点了火起了灶啦！住了多长时间？唉呀，总有小一年儿吧，听说长治不打仗了，这才拖家带口回来。要说这档子事儿，真你妈妈惨点儿！”

李家的故事，是数万外地人在长治大规模武斗时期一个悲苦侧面。

长治人民文革大逃亡，史无前例。这算哪回事呢？水灾旱灾风灾蝗灾雪灾雹灾兵灾鬼子？都不是，而是人世间革命战火临头。

绝境求生

走掉的人固然走了，逃奔的人也都逃了，上党古城十室九空。遥远乡村尚且保留着少许安宁，躲在那里喘息，总比子弹横飞射中躯体强一些，总比炸弹无辜炸死强一些。而滞留长治的可怜家庭，可就困难重重了。粮食稀缺，是第一大难题。

地委各个家属大院里，到处是垃圾，到处是炸弹摧毁房屋后的破砖碎瓦，断壁残垣，临时工事，被冻结的动物尸体，人的血迹。原先这里有几百户家庭，现在只剩下八九户倒霉蛋。此地与军分区后院紧密相邻。

特别悲苦的一户姓马。老干部马槐成在文革前夕只身调往晋南山区，去援建一个巨大的“三线”工厂，很少回来。这家人由一位老母亲，领着四个上学的儿子，艰难生活。想不到的是，四个儿子分两派，而且都很坚定。奇数马老大马老三，生活在红字号最重要据点——西招待所指挥部里，双数马老二马老四，生活在联字号最重要据点医专校园里头，两据点之间日夜炮击不停，互袭不断。四兄弟两大派，凭一身肝胆，过着血腥而又壮丽的战斗生活。这就把老母亲给急坏了，什么红字号联字号，在老母亲眼里，都是马家亲骨肉这一个号！万分危险之中，老母亲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往返于两派据点之间，硝烟弥漫蒙泪眼，她要把儿子们一个一个往家里拖。母亲们总是觉得，不论外部世界多么凶险，只要像老母鸡保护鸡娃们那样，把儿子们拢回到自己的羽翼下，才会安全，才能放心。结果呢？老母亲只拖回来一个小四，其余三个，不迎来胜利曙光，誓不还家。

这位小四也是我们同学，后来在北京工作，官至局级。前些年老母亲去世，他写了一篇悼文，送给我看。内中忆及母亲在最危险时刻，冒着炮火，去据点劝导儿子们还家。我读到这里，热泪顿下。我们做儿女的，年轻时总是固执地去做自己想干的事，忽略了母亲那伟大的焦虑。真是惭愧啊！大革命魔力渗透到家庭内部，直接对亲情造成摧残。多少夫妻，悍然反目，多少兄弟姐妹，同胞对仇。此类例子在文革派战中举不胜举……

母亲们在危险中，承当了文革灾难最大苦痛。

滞留在家属大院的几户人家，加上周边零散的干部家庭，很快集中到一个小内院儿抱团居住。此小院之外的大院，成为联字号保卫医专总部的前沿地带，也成了红字号发动进攻的冲突地带。于是联字号战士们把外侧排房，包括死去的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家和老作家韩文洲家，也包括撤到内院的老干部马槐成家，全部变成了防御工事，用火箭筒打穿排房内部各家墙壁，便于战斗穿行，把朝外的墙壁凿开射击枪眼和观察洞，战士们固守其间，日夜对射。红字号的炮弹动不动就打到了大院中。炸弹爆裂，母亲们的心随着房屋破碎而滴血不止。

家属大院原为天主教堂大院，系当年荷兰传教士督修，筑有多处坚固地下室，这些天成为家庭主妇们拖儿带女的避难所。晚间，在双方炮击时，地下室成为防空洞。常用的一大间被母亲们打扫出来，安放了煤油灯，铺了被褥，各家占一块地方。

忽一日，地下室的煤油灯被孩子们打翻，煤油泼倒下来，迅速引燃了所有被褥，母亲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疾呼，火势越烧越旺，母亲们率领子女奋勇突围。地面上炮弹呼啸，地下室烈火熊熊，大人孩子全被熏成了黑面人，露着白眼球白牙齿。最糟糕的是，同学吴梅的妹妹，陷在火海中，这女孩儿被公认为大院里最美丽的第一女娃。烈火中，近旁一支军分区连队刚刚入驻，母亲们的嘶喊惊动了部队官兵，有战士奋力冲入地下室火阵，把这位小女孩抢出来，保住了美女一条性命。问清楚吴家是联字号家属，便把烧伤女娃急送军分区院内，给予紧急救护，使她关键性的脸部得到及时治疗。后来这女娃在临汾工作，多年后我见到她，首先注意观察她的脸部，还行，平滑肌肤上淡去了文革烈火的痕迹。我对她玩笑道：“吴美女，幸亏你们家当时是联字号啊。”

吴美女就说：“那是真可怕，把我妈急出了一场大病哩。”

母亲们焦虑在战火中。除了亲人不要被炸死，不要被烧伤，儿子在据点里不要中弹，丈夫不要被抓走之外，最焦虑者，还是粮食危机，且日甚一日。

干部家庭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月供标准吃粮，平日里本来就不够吃。那时每个家庭孩子多，正处在生长期，所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即指能吃而言。大战开始后，全市粮店关门停业。逃走的家户去往农村，吃粮尚可凑合，滞留大院的家属则发了愁。各家千方百计节省粮食，要打持久战，半饥半饱度日。

现任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杜培德先生他们家，当时也是四个男孩。粮食问题日近燃眉，偏偏他妈妈又怀孕数月，要生老五了。

怎么办？杜培德先生后来对我回忆：“咱家从东边一个院子躲住到天主堂内院，家家闹粮荒。原先那个院子离医专更近，七排房，跑得一户不剩，我家那排房直接挨了炸弹，一个大洞炸开九排瓦那么宽。院子很快被打烂。我老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就要断粮，还要生老五。一点儿办法没有了，老妈只

好冒险决定：先让我大哥逃离此地，减少一张嘴！留下是饿死，逃回武乡老家或许还能活下去。这炮火连天的，大哥一人独走，肯定危险万分。但在当时没有任何办法，我们都小，走不了远路，大哥能走，好像也能认住路，二百多里地，要看他的命硬不硬。——说是大哥，其实不过是个青少年吧！我妈含着眼泪，挺着大肚子，给大哥弄了几个干粮，趁战斗停歇之夜，把他送出了大院。大哥在冰天雪地之中究竟怎么回去的，全家都不知道，好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我妈急死，也没有办法。直到武斗停止后，才知道他一个人赶路，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回到武乡老家后，老家人根本认不出来，整个人都变成了鬼样。

“老大冒险走了，还是嘴多粮少，又想办法让老二走。老二小些，赵兄和你是同一个年级吧，哪能走远路，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带上我爸一封信，逃到长治东郊外。走十几里地有个桃园村，我父亲在这个村下过乡，便委托一户老农暂时收容我二哥。人家凭着对老干部的深厚感情，真把我家老二收留了好长时间，可算减轻了我家一些负担。”

杜培德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真是一波三折，后边还有更多内容。这不，老大大步行逃回了武乡县，老二逃出了长治城，老妈快要生产了。然而不管你怎样减少人口，节省粮食，粮食还是正式宣告断绝。这一回，真是丁点儿办法没有了，眼看着杜老三、杜老四饿得嗷嗷叫。院里有的小孩儿甚至啃吃煤炭。几位母亲心如刀绞，伤心无助，聚在一起泪纷纷。这时节也不管谁家红字号谁家联字号了，娃儿们吃不上东西，那些革命派有甚用？

杜培德先生回忆：断粮之后，大院里有五位母亲聚在一堆儿，郑重商议起来。开始，是想相互挪借一碗米半碗面，周济周济，一碰头，各家都困难，连一把米也借不出来了，这时候，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说逃难远去的家户中，可能存有少量粮食，尚能救急。事到如今，只能到残屋中去寻找希望。

饥饿之人，不容多议。五位母亲立即行动起来，进入断壁残垣中逃难者家里搜索。这一行动，打破了他们多年恪守的传统守则。

到处是弹痕，到处是紫血，到处是战斗通道。母亲们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把一家家破烂厨房翻了个遍，仔细搜索粮食柜子米面缸——哪有一粒粮食？哪有黄澄澄小米？她们把那箱子把那缸奋力翻过来，口朝下，抖一抖，磕一磕，试图抖出些粉粉末末面面渣渣来。

这不济事。五位母亲绝望中看一看大院外面，似乎外部世界有什么指望。这时，有联字号武装队员到工事中来，便喝斥她们：看什么看！还敢出去？外面全是地雷，炸死不负责，让红字号打死不负责啊！

就在母亲们最绝望时，她们发现了一座闭锁的房屋。这房子尚未受到损失，一把大锁居然完好地把守在门上。窗户被砖石垒着，门前堆拥着败叶残雪，杳无

声息。

这是谁家呢？这闭锁的房门里有希望吗？

这正是前头所写同学何明、何星他家。小哥俩随母亲把重病父亲从看守所接出来，用架子车推上，逃回了沁水县远村。

五位母亲怔怔地站在何家门前，惶然失措。别看她们敢于在断壁残垣中搜寻粮食，面对一把门上铁锁，却如火中取栗，当下止步不前。传统道德许多约束，告诉她们这锁子不能动。当她们在太行山里做小姑娘时候，老人们就告诉她们：别人家虚挂着门钩子，说明主人不在家，无论如何不能进。村中她们自己家，不也一样吗？出门随手虚掩篱笆，绝不会丢失东西。

曾在断壁残垣中翻腾他人面柜米缸，母亲们内心已经很不好受。

现在，面对何家一把铁锁，她们无力战胜自己：何家同样子女一群，万一人家回来，主妇拿什么给孩子吃？她们又进而议论，何家主妇脾气可不好，遇到坏事敢骂任何人！

杜培德先生告诉我：母亲等五人，那天晚夕在何家门前徘徊许久，到天黑时依然没敢行动，饿着肚子，各回各家吧。

又是一个枪炮呼啸的夜晚。

任何道德力量也大不过饥饿力量。

次日上午，惨淡的太阳又升起来。五位母亲再次齐聚。她们经过一夜思想交锋，不约而同想出了一个办法，又不约而同地纷纷表示完全同意。

甚办法？民间老办法：文凭字据，签名画押，互相监督，共同实施。在战火中取粮，保子女过关。

如果建立当年的博物馆，这五位母亲在艰难困境中的寻粮字据，是有资格列入的：战火纷飞里，为了全家生存，饥饿的母亲们立字为凭，要砸开锈锁，共同担起责任，今日取粮，战后偿还，无福可共享，遇难要同当。

她们在字据上乱纷纷按下手印，然后把这张纸郑重收藏起来，等待着日后有一天，交给何家主妇。

母亲们履行了这番“手续”，心定了，一切可以开始了。她们提着斧头，坚定地走向何家走去。

写到这里我双眼模糊，为母亲们悲恸。

手起斧落，锈锁顿开！

推门处，灰尘腾空扑面。五位母亲急匆匆走进厨房，急匆匆打开粮柜，她们为之一振，她们终于真真切切看到了生的希望——何家确有部分存粮，尽管虫吃鼠咬，粮质有变，但在母亲们看来，却比黄金珍贵万千倍。

五位母亲一碗一碗地平分这些粮食。然后把每家分得的粮食细心过了秤，记

在了账上，将来要与那字据一起交给何家人。

杜培德先生回忆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老妈分到的粮食是整整二十斤杂粮面！就是这点儿粮食，救了我们全家。咱晋东南人过日子，找到一碗米，就能凑合很长时间。”看那热气腾腾的锅里，撒盐少许，有土豆块、有老玉米，有萝卜条，有南瓜丝，有杂粮面，有菜帮子，有糠麸皮，有柿子渣，有干豆角，重点还须一把小米。和子饭，也可以写成联合的合字，凑合的合字。合子饭，合到一起养人家。是啊，这种山西晋东南独有的稀粥，当年养活过国共两党抗日千军万马，今天又让太行百姓熬过了“大革命”苦难。而且，杜家母亲靠着这种和子饭，还在战火中生下了她的第五个孩子。

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当槐花又开时候，枪炮声渐次停了下来。何家人终于从沁水县乡下回到了久别的地委大院。到家一看，已是百物全无，一片狼藉；砸锁借粮的五位母亲离去后，房门洞开。何家也成了天主堂大院联字号对外工事之一。早有各种各样的乱人，彻底洗劫了何家。

何星对我回忆：“我们回来那天，一看，咱家墙上开着好几个枪眼，成碉堡了。衣服被褥丢个精光，稍稍值点钱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家中当地一个弹坑，墙上布满弹痕。印象最深的是两口樟木箱子里装满了渣土，被当作掩体用。到黑来天冷，我和我哥何明没有盖的，就去地委院里四处找了两条棉门帘子，就是公家那种冬季帘子，靠这两条破帘子睡了好些天。我妈脾气不好，看到家里被祸害成这样，伤心啊，急得她哭了好几回。”

就是在这种情景下，那五位砸锁借粮的母亲，相跟上，战战兢兢来到了何家女主人面前。何星妈不知何故，看见五位老姐妹来找她，一个个苍黑削瘦，几无人形，又是这般垂头丧气表情，甚感奇怪。她认为家家都遭了难，便大骂联字号武司令员，同时大骂红字号程核心组长：什么东西？不管你姓武姓程，把俺们家毁成这样，叫百姓没法过日子，你们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一个是正确路线！

五位母亲更加惶惶无措。终于，一位年岁最大的老母亲站了出来，请何星他妈息怒，听老姐慢慢跟你说。

何星妈静下来，听老姐一五一十，老泪纵横，把立字据砸铁锁借粮救娃的灾情，实实在在讲了一回，讲着讲着，老姐取出了那字据，那账条，何星他妈顿时和五位老姐妹哭作一团。

哭一阵子，何星妈又笑，她说：“俺那点儿粮，能救了老姐妹和娃们大饥荒，实在是好事啊，比坏蛋搜去强，比老鼠啃吃了强，俺何家积了德，俺做了好事啊！”

六位母亲就笑，笑完又哭，激动不已。

最后，杜家那新生的战地婴儿，在母亲们的怀抱里沉沉睡去。

战火围困中的太行妇女，与饥荒抗争，搞粮方法形形色色，令人唏嘘。那么，尚有极少数未能逃离出去的老干部，又是如何度过危难的？我们再看一例。

地委天主堂大院里，还滞留了我的老友高民宪一家。高家就他一个男孩儿，姐妹倒是好几个，人口不少。他老爸，文革前从北京城里中共华北局调长治地委，行政级别较高，母亲亦有资历，是当时晋东南地区惟一女县长。高家儿女特别循规蹈矩，绘画绣花，做文章，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由于悉数在北京上了中小学，普通话清响纯正，因而更显出言行规范，举止有礼。我上他家去玩，他爸他妈无一次不在肃穆中读书看报。属于正统中共高干家庭类型。民宪临出门，总要低声请示：“妈妈，我和赵瑜出去玩一会儿，行吗？”在他妈略作思索并表示允许后，他才跟我走。这就与多数干部人家很不一样。例如吴增义家、刘小四家、田糊糊家、郭宪平家、赵小五家、张书堂家、李小旦家，大伙儿总是抬腿就走，来去自由。

运动既开，高家先受批斗之罪；战火复起，高家转受饥寒之难。

老高伯伯是晋中辽县即左权县人，属太行老干部，多年离家革命。倘如今逃难回乡，身负“走资派”责累，自有诸多不便。全家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大院里原地不动，苦等时局转化。

开始时，老高伯伯一任头上炮弹横飞，尚能正襟危坐，手不释卷，从容研读马列。虽无报纸可看，认真读书也好。他时而举头凝望窗上砖石，辨听过往炸弹落点，沉着判断战事进程。

慢慢地，老高伯伯屁股坐不住了，他严肃地往复踱步，且步频一日比一日快。原因很简单，家中粮食殆尽，已由危险转向火急，全家由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又改为一日一餐，再改，只能两日一餐甚至三日一餐了。到后来，老高伯伯在县长阿姨的劝阻下，停止了踱步，说那样更加消耗能量。他改成枯坐长思了。

任何阶层任何身份的人，在全家饥饿面前，都必须想办法。高家并不缺钱，缺的是弄粮食的途径。现在有钱无粮，何来什么好办法？

老高伯伯历经战争岁月且吃过运动之苦，他枯坐长思正是在想办法。哪里有粮食？哪里有不违法不乱纪就能获取的粮食？哪里有不丢性命就可以获取的粮食？搞到粮食以后，到运动后期怎么定性？历次经济整肃和四清运动阴影，哪个老干部不清楚？有的人因为查出了几块钱，一辈子难以翻身，老干部怎能不谨慎？

高家与前述五位母亲的顾虑显然不同。母亲们顾虑民间约束，老高家顾虑党纪国法，干部们最看重运动后期甄别，政治生命。

不过，高老伯身份虽与五位家庭妇女不同，其觉悟亦高，但他们同样是负责

任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面对战火饥荒，面对一天天消瘦下去的孩子们，高家的危机焦虑，和五位母亲是完全一样，毫无区别的。

人在饥饿中。老高伯伯躺在防范炮弹的床板下头，一夜辗转反侧。其实，他心中早已锁定了粮食目标，只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敢轻易行动罢了。

这目标高老伯是比较熟悉的，一般干部则不熟悉。由于不熟悉，因而想不到。

地点就是原地委供高级干部就餐待客的所在：高干小灶粮库。眼下那里早已锅塌火冷，地处两派交战中间地带，是危险区，也是无人区。从天主堂大院向西，走一段夹缝小路，翻两道墙，过若干小门，七转八拐，便可以穿行抵达。老高伯伯在一次次踱步中，早把一条最佳路线在胸中踩好了点。

倘在和平年代，没有人相信一位地委高级干部，会去谋取小灶上的粮食。

文革乱世，便有这等奇酷事件发生。看几十年灌输的种种理论，半个多世纪修炼的红色修养，空洞高远的绚丽理想，在全家饥饿面前，尽无意义。而今且为稻粱谋吧。

夜空里，炮火呼啸不息。老高伯伯一跃而起。他轻声叫醒了我的老友民宪，仔细向儿子交待行动方案包括种种细节，然后，父子俩换上了黑色衣服，把粮食布袋揣进怀里，取好了火柴，晋东南老乡叫“取灯”，带上了撬锁工具，扎紧了鞋带，说不定他们还用锅底黑灰抹了脸面。二人在五更天峭寒中，静悄悄潜入茫茫暗夜……

民宪后来向我回忆：“我老爸的判断包括行动方案，一点都没有差错。小灶库房里，虽然没有整袋粮食，却还有各种小杂粮和米面残存着。我们不管什么品种，能收入布袋的，乱七八糟收了几十斤呢。就靠着这袋杂粮，我们全家又坚持了俩月，度过了战乱灾荒。”我感慨万千，说你老爸真行，像军事特工似的。

后来，民宪在某医学院教书，高伯伯担任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或党委书记。我时常见到老人家，衣衫整洁，一派平和淡定神情，仍然透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雅与严肃，半点儿看不出当年夜潜粮仓的紧张影像。彼社会科学院，不知该怎样研究文革？又怎样研究运动中饥饿与革命的关系？

地委天主堂大院周边各个家属院里，残酷故事真是太多。

亲历一场血战

幸福家庭总是相似的，难民人家各有各的不同。现在讲一讲我自己家的事。我家五口人，却是冒了生命危险能够获粮维持的一户。

在全城封闭围困之前，我父亲从晋城送葬回来，最着急恐慌的大事便是买粮。战局日紧，粮店突然贴出告示，大意是：本店在战火中最后一天售粮，从明日起

关门避难，有胆大者速来购买！我父亲抱着冒险一试的心理，在这天前晌，骑自行车带着我妹赵珍，去长兴街粮店抢购粮食。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重要消息，仍在外头扎堆儿游荡，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因而我爸没有找到我。父女二人急急奔赴粮店。结果，粮店人说，品种不全，只剩下白面了。我父亲央告说，白面好啊，我们能否把后边几个月的白面比例全买了？人家说，再往后你们全家光吃粗粮吗？不过日子啦？我父亲苦笑道，这仗眼看还要大打，又不通车，我们河北人回不去了，一旦断粮全家饿死，还是过不成日子嘛。就这只标准口袋，尽量给装满吧！——或是遇上了一个好人，或是一切乱套，或是人家急于收摊儿，反正粮店师傅取过我家粮食供应本，一路红笔对勾，把后几个月的白面都卖给了我爹。差不多五十斤吧。老爸千恩万谢领上我妹，推上那袋子白面就走。今后数月，全家人只有靠它了。

说时迟那时快，几分钟不过，父女二人刚出粮店上了演武巷，在返回地委家属区必经之路上，枪炮爆烈，红字号与联字号的一场战斗打响了。我爸身后，粮店那厢，劈里啪啦一片关门上板子声。我家成为这条街上即整个地委行署人家，在最后一天买到预购粮的最后一户，尽管品种单一。

从这一天起，一大片晋东南党政军驻区，再也没了闲人，全面成为战场。困住了少数人家，再也走不出去了。

枪炮炽烈中，我爸匍匐在马路上，以那袋白面为掩体，紧张地观测前方战况。一个劲儿冲着我妹喊“卧倒”，自行车摔在一旁。

顺着马路，双方用机枪毫无顾忌地喷泄着子弹。从地委大楼横穿马路的三名海军，被击毙一人，击伤二人。红字号又杀出第二支突击队，从西招待所冲出来，一个扇面散开，沿马路两侧向东攻击前进。

枪声大作。这条大约 500 米的直筒子马路上，随处可见卧倒在地的过路人。子弹在距离地面一米多处，嗖嗖地往来扫过。两厢围墙被打得砖石迸裂，劈啪作响。果然如我爸日前所说：你再不敢出去玩了，他们白天都会打起来。这才是个大前晌，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根本不管街头还有多少生命，果真开打了。

这条街由西向东排列单位如下：越过粮店，是红字号重要堡垒专建公司，两厢筑有街垒工事，砖砌碉堡达三层楼高，四处枪眼。介绍这一点对后边很重要。我父亲推粮向东，刚刚过了此处，战斗打响，正到达了行署家属院门口，俗称红房家属院，相对是地区电影公司。父女俩就卧倒在此处的马路旁。再往东几十步，是地区礼堂广场。左手即红字号指挥部西招待所，又呈十字路口，向南顶住头就是军分区。过十字路口继续向东，右手地委五层大楼，左手地委老宾馆，顶端是我的母校友谊小学，向右可通往天主堂大院、军分区后门和我家四合院等处。这一区域往日风景甚佳，如西洋油画，巨树参天，群鸟飞动，更有教堂钟楼高耸。

激战中心正是此地。

文革故事真是千奇百怪。我父亲平时批我不管家，到处窜，乃至最后一天买粮找不到帮手。未料，买粮出来，双方战斗打响，行人大乱，紧急卧倒在地。马路上被机枪打起成片沥青来。待我父亲再次抬头观测时，忽然发现他身边不仅有我妹，而且竟然还有我！枪弹如雨，我在此时此刻忽然零距离卧倒在他们身旁，真是神奇怪异之至。

情况是这样：当时我们一伙人正在礼堂附近玩耍，由刘四平、张玉河等老兄向我教唱俄罗斯情歌《红莓花儿开》。我说那还用教，听都听会啦。教人唱，不过是为了自己美。我们议论近日谁家谁家逃难走了，咱人马越来越少了，想打群架也打不成了，边议论，边观看西招红字号武装人员乘车进进出出。教我唱歌的大哥们多是中学老红卫兵，爱穿黄军装，现因父母问题失去了斗争兴趣，正消极对待运动。有一二九师老八路之子刘四平（出生在东北四平市），沁水县委首脑之子孔生长，教育局长之子张玉河以及行署干部之子“老秦”，加上我一个小学生。突然，西招待所红字号杀出两个排战士，端着枪向东射击进攻，情况突变，我们五人大惊并立即向行署红房家属院奔逃，刚跑到院门口，枪炮震耳欲聋，我猛然间看见我爸领着我妹到达此处，随着我爸对我妹大喊“卧倒”，我正好应声卧倒在了他俩身旁，就这么巧。

至为恐怖的是：刘四平、张玉河、孔生长、“老秦”四位老兄，发现我与老爸会合，便不再管我，越过我们仨，径直跑进了红房家属院，停留在第一排“老秦”家门口喘息。他们认为院内无战事，相对安全，却没料到，红字号正从建筑公司那座高高碉堡上，策应前方战斗，忽而把这四位老兄的跑动尽收眼底，可能是黄军衣惹的祸吧，当他们站成一堆，喘息议论当口，炮楼上的机枪冲锋枪对准他们开始扫射，很可能把几位小伙子当成联字号突袭小队了。

可怜我这几位兄长——其实仍是孩子吧，并不知道碉堡上射来的子弹，眨眼间纷纷倒在了血泊中。四个人同时被击中三人，可见那子弹密集程度之高，发射之准，我若在其内，必被射杀无疑。

刘四平老兄面朝炮楼，子弹从小腹打进，从屁股上穿出，孔生长老兄侧站，被打断了胳膊，“老秦”则被击中小臂。叹意志消沉的老红卫兵遭遇莫名扫射，那无辜鲜血，当场流淌了一大片，浸染着“田野小河边上红莓花儿开”。那一刻，我正卧倒在家属院门口马路上，脸朝东，不知为何身后一片枪声？紧接着听到院内兄长们中弹后的凄厉惨叫声。我大吃一惊，正想回头相看时，我爹一把将我的头按在面布袋上：“不许动！听我口令，准备冲出去，这里马上就要挨炸弹。”

我必须在此处插叙一下这几位老红卫兵的惨况：他们倒在血泊中，血流不止，再流一会儿，至少刘四平老兄会死亡。万分危急，几位负伤老兄哭喊无助。大多

数人家已经逃走，院内少有人气。正在这时，又是一名无畏母亲出现了——这位中年妇女本来在家中躲枪弹，忽然，透过砖垒窗隙，听到了院内孩子们中弹后的嘶喊，一颗母亲的心抖动着，她看到血泊中垂死的青少年伤员，母亲不再恐惧，冲出房门，迎着满天飞舞的枪林弹雨，毅然向专建红字号据点奔去。她是无畏的，她又是智慧的，她知道那边有红字号战地救护队，她边跑边喊：不要开枪！你们打中孩子啦！都是红字号孩子啊！其实，刘四平老兄他们曾经是太行中学“反到底”成员，还算联字号哩。

终于，专建红字号救护人员出动，迂回到达四平兄他们身旁，紧急救护止血，匆匆把青少年伤员抬走，上了一辆作战卡车，向城南红字号大本营淮海兵工厂疾驰而去。他们被送进了战地医院，受到了红字号伤兵的救治待遇，万幸保住了年轻生命。

这位母亲，我后来一直没有查找到。

为什么说运送伤员的车是一辆作战卡车呢？这是四平兄告诉我的。他说，他被抬上卡车后，竟又清醒了，见车上有许多手榴弹，前后架着机枪，车厢里侧，焊了一圈钢板，近乎装甲车，子弹打不透。战斗队员全部持枪蹲在车厢里，连续不停向外投掷手榴弹，一任卡车前冲。到达淮海厂医院，四平兄看到，正在救助的红字号伤员可就多了，缺胳膊少腿，走廊里尽是血迹，足有上百号吧……我知道，这是一次血腥的大爆炸造成的。

刘四平几位老兄算是命大。这一边，我和老爸以及我妹赵珍以及那袋白面的命运怎么样呢？

在卧倒时，父亲命令准备冲出去，他急促地说，咱们一定要向前冲，冲进地委大楼里头，冲到一楼大堂就安全了，这里马上要挨炮弹。他趴在马路上，又嘱咐我们兄妹，一会儿向前冲时，千万溜边儿跑，沿着马路右边那排小松树跑，谁也不要等谁，千万不敢停下来。

我抬头，越过粮食布袋向前瞭望，看见地委大楼正面马路当中，躺着那位被击倒的海军战士，因是灰军装，容易辨识。在红字号火力掩护下，从老宾馆冲出一伙海军战士，把这具尸体拖回宾馆院内。

东面顶了头，是联字号据守的友谊小学街垒。那里的机枪火力控制了整个街巷。我的母校是一所与苏联人携手共建的太行太岳干部子弟小学，此刻充满了共产国际一向推崇的暴力战争气氛。

突然间，枪炮声停下来，我耳朵里一股劲吱吱鸣响，双方短暂停止了对射。卧倒在马路上的人们看到，红字号武装小队穿着黑色大衣，架着伤员往西招待所跑，人们判断这必是一个珍贵空档，便不约而同从地上跳起来，四散奔逃。我父亲喝令一声：“快！”我们仨迅速扶起自行车，艰难地把那袋白面搬到车子后架上

——这是决不能放弃的。父亲弯腰奋力推车向前，我们沿马路右侧疾跑，向东冲往地委大楼。而大部分群众则向南、北、西三个方向逃窜。

忽然，身后传来我家近邻老婆婆的疾呼，她是一位半大脚的太行乡村老妇，我们回头看时，她正一颠一颠地横穿马路，追向我们，她大声地呼唤着我和我妹的小名，直呼“等等我，等等我呀”。这时我们刚好冲至大楼前，我想等等她，当我稍做犹豫时，更强烈的枪炮声再一次爆响在长街四周，我只好奋力帮助父亲把自行车包括那袋白面推上好几层台阶，仓皇冲入一楼大厅。

密集的枪炮声隔在了楼外。我们仨大喘着气，把车子支在大厅一角，用身体扶着那袋子白面。父亲喘着气问我们：“没，没受伤吧？”我和我妹说没受伤，只是那位老婆婆却不见跟进楼来，她是不是被枪弹打死在楼外了？

父亲叮嘱说：“就在这里站着，绝对不能乱跑。”这显然是说我的，事到如今，我还敢往哪里跑？

父亲抬腕看一下表，轻声自语道：“他们应该吃午饭吧。”那意思是，这一仗总该收场了。

父亲话音淹没在炮弹爆炸声里。最近几发炮弹，震扬了楼内许多灰土。

“哐”地一声，楼门突然被撞开，冲进来七八个持枪汉子。很快，楼门内外，站上了多名岗哨。从他们身穿黑色棉大衣看，这是几位红字号作战指挥官。为首一位中年首领，短发大脸胡子乱，身材精壮面色黑，提一支大号手枪，一进楼就用紧急口气在部署什么。他的形象给我一生留下深远印记。当时，在场的人称他“老赵”，我猛一下想起，这人到地区体委运动大院来过，体委赵玉田老伯和秦海庚老师都与他相熟，他们把几辆运动摩托车拆开又装，装好又拆，多次发动试车，不厌其烦。现在他成为红字号组织中名气最大的指挥官，他正是淮海厂的赵震元，早年的小八路，属汽车摩托车运动“发烧友”一族，修车高手。1950年以来，晋东南体委开展军事体育项目，如射击、跳伞、滑翔机、摩托车等，在全国是成绩突出的地区之一。国家体委在长治近郊屯留县，建有跳伞及滑翔基地，1968年改为国家体委“五七”干校。赵震元在淮海厂里是个模范技工，经常给体委加工一些汽摩异形零件。常见他来体委，开着一辆崭新美式军吉普，风风火火的，一来就和赵老伯秦老师蹲在库房那边，没完没了地鼓捣那几辆摩托车。咱是小屁孩儿，插不上手。

我们刚从血腥的巷战中冲到大楼里，想不到钻进了临时战地指挥所。我们紧靠在老爸身边，在楼厅偏角处，一动不动，观看大厅中央赵震元他们调兵遣将。有人朝我们这边审视：一个衣衫破烂面容苍黑干部，领着一男一女俩小孩，护着辆旧自行车，显然不重要，便无人驱赶我们。

楼门开开闭闭，刚出去一伙人，显然是去增援前头，又急急进来一个四零火

箭筒三人小组。他们听赵震元简单交待几句，就取过数发四零火箭弹来，用手掌把炮弹尾部钢片小翅膀顺时针一拧，插入了发射筒前端。赵震元一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拍拍年轻战士的肩膀，此小组便转身出击了。一个提着装好了炮弹的发射筒，两个助手各提四发备用弹。

不知为什么，此小组出击前，他们在楼里，分别把多发火箭弹打响了清脆巨响，并伴有青烟，是打响此弹的底火保险之后，才能正式发射吗？我至今不得而知。当时楼里那震耳巨响把我们吓坏，我妹赵珍长时间咧着嘴，好像随时要哇哇大哭模样，不过她还行，抱着我爸的腿始终没有哭出来。嘴巴一直那么咧着，浑身颤抖不止。

火箭筒小组刚刚奔突出去，楼门“哐”地一声又被撞开，四五个战士抬着一名血淋淋的伤员冲入一楼大厅。他们喘着气，把昏迷中的伤员放在楼厅中央水磨石地板上，向赵震元指指划划地汇报情况，赵震元绷着脸，一言不发。这时，冲上去几位救护人员，蹲在伤员跟前，先是解开伤员身上黑大衣，武装皮带，摊在身体两侧，然后拿剪刀当胸剪开他的上衣。伤员很年轻的样子，却是面如土色。他那上衣好几层，尽被血浆浸透。我发现老爸同样面如土色，我们静默地目睹这一切。那上衣被剪成两大片，分别揭开至伤员身体两侧，露出了人体冒着热气的胸膛。赵震元等人围拢过去。我这边暂时看不全面。

“哐”地一声，楼门开处，又急急闯入一人，从他边走边掏听诊器的动作看，这是来了一位战地医生。别人闪开，让他蹲过去查伤，他翻了翻伤员的眼皮，是查看瞳孔吧，然后站起身来，很清楚地说了三个字“没人了”，也许大家对他的诊断并不意外，当时无语静默，这三个字听起来非常真切。

就在人们放弃抢救，站起身散开时，我清楚地看到了死者的伤口。由于伤口四周刚被纱布擦过，因而那伤口十分明确。死者胸部中了四枪，两个胸大肌上各中一枪，下面中两枪，四个枪眼呈血红色圆点，在他胸膛上排列成一个口字形，四个伤口伴随着热气，向外鼓吐血泡，形如四朵红莓小花。牺牲者炽热的血液即将流尽。

赵震元他们复又研究战事，脸上添了悲壮神情，部署新的战术行动。脚下踩着血。

有人把尸体从楼厅中央拖向一旁停放。哪一旁？我们这一旁。抬尸体者并不在意这里站着我们三个活人。他们把死者拖拉至我们面前两米处，把那血浆浸透的大衣覆盖在死者身上。我闻到新鲜血液热腾腾气息，有些腥甜味道。这时，楼厅地板成了血染世界，人们踩着血迹四处走动。

那位手持听诊器的战地医生，高高的身板，腰际别着手枪，兀自走到死者跟前来，默默站立片刻，他似乎在说：好兄弟，我救不了你了。

这位医生的形象给我印象极深。可以肯定，他不是我所常见的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人。他年岁不小了，秃顶，瘦长脸上布满皱纹，神态沧桑。他披件大衣，显得细瘦挺拔，腰板直挺挺地站在我们对面。他微微低头看过了死者，转身而去。当时我胡思乱想，莫名其妙地觉得他特像国共两党战场上留过洋的少将医官。至今我不明白为啥会有这样的荒唐联想。

外头枪炮声仍在继续。隔着尸体，楼门开处，两位炊事班战士肩上倒背着步枪，推一辆三轮板车进来。车上放着一个大平箩，上面用棉毯盖着，装满了白面大肉包子。毯子一揭，热气蒸腾。

这包子显然来自西招指挥部。赵震元挥挥手，十几个头头和警卫从容走过去，抓取包子吃。他们的手，多是腥红色的，沾满了方才这位死者包括其他伤员的鲜血。腥红色手掌掐着大白包子吃，格外刺眼。战士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吞吃。我咽了两口唾沫，也许没咽。

尸体兀自躺在大堂，没有生息。

我们仨定定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我感到了赵珍浑身仍在抖动，可能是吓的，可能因为寒冷，但主要是被吓的。我听到父亲轻微的叹气声。我在想：这仗打了一上午，到现在刚打了一半啊？要不指挥员们怎么在这里开饭呢？

简短饭毕，一部分指挥者急急出楼去了。他们要率队向天主堂大院和友谊小学方向，发起新一轮猛烈进攻。

枪炮声再次爆响起来。

陆续有新伤员进楼救护包扎。重伤者就地休息，轻伤者复又冲出去。

一位进出次数较多的人，提一把冲锋枪，非常精干，应不到三十岁吧。听见赵震元几次叫他“小杨”。这是红字号专建组织的头头，名叫杨万盛。他本是一名中专毕业的技术员，据说很有组织才能，群众基础较好。他所率领的“专建红卫兵”，是红字号里头一个非常顽强的骨干组织。经过多次战斗，杨万盛得到众人信赖，在“红大”总指挥部里担任副总指挥。

半下午时候，这位“小杨”指挥手下人，从我们面前，把那具尸体抬出楼外而去。

抬走这位牺牲者，似乎告诉饥寒交迫中的我们，战斗接近了尾声。又过一阵子，楼外渐渐稀疏了枪声。

双方整整对攻了一个白天。

在父亲带领下，我和我妹迈动早已麻木的双脚，紧紧护卫着那袋子白面，出了地委大楼，沿着马路边残雪墙根，推动车子，一步一步向家里走去。那一刻，暮色正浓。

从地委大楼去往天主堂大院，到我们家路口，一路上随处是炮弹坑、碎石块，

这里一滩血，那里一滩血，随处可见散落的子弹壳和一个个机枪子弹箱子。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没有炸响的手榴弹——缺失了后盖，白色丝质拉弦露在尾部。一些大树枝被弹片削落在街头。天主堂大院那扇铁条大门被炸歪，好几根铁条竟被炮弹削断。路过友谊小学操场，我特地想看看母校那边受损情况，然而那里被打得七零八落，甚也瞧不清楚。

与军分区后门遥遥相对的是地委医护门诊所，老友吴增义他妈妈，曾是该所主治医生。那一仗，这间门诊所被红字号当做了机枪阵地和四零火箭弹发射工事，以攻击天主堂大院，扼制军分区后门，到战斗快结束时，反被联字号的迫击炮弹或同样的四零火箭弹摧毁。我们路过这里看到，门诊所三间平房，被炸成一片废墟。

我脱离那片战地，最后看到的是：我的老友高民宪，横刺里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猫着个腰，顺着墙跟儿往天主堂大院摸索前行——他要回家。我惊异了一下，想知道他在哪里躲过了这天血战，很遗憾，这老兄没有看到我。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在饥饿中，随他老爸去地委小灶“行动”了。

就在人们即将被暗夜吞没时刻，我们仨终于回到家中，与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会合了。我妈早已焦虑万分，此刻正准备冒险出去寻找父女俩，然后再找我。

当天晚上，我们听到一声巨响，距离甚近。早晨溜出门看时，发现是军分区用重磅炸药，炸毁了我们出门必经的一座古门楼。武斗前同学们回家，时常在古门楼下避风避雨，或在门楼里集合聚会。现在看时，这门楼七梁八柱悉数倒塌，古砖古瓦硕大无朋，堆集成一座高达十几米的废墟，彻底堵塞了红字号进攻军分区后门通道，也彻底堵塞了我的出行通道。我们家，从此完全困在了文革战火的死胡同里。这一炸，彻底斩断了外部世界对一个少年人的全部诱惑。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弄回来的那袋子白面，开始一点一点地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当天晚上乃至第二天、第三天，我家的近邻老婆婆，一直没有归来。我们确信，她肯定被那阵子机枪扫射打死了。

她在最紧要的关头，她临死的时候，还高声呼唤过我的名字，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就是不吉利吧——我当时这样想。

寻访杨万盛

2004年秋季，我驾车奔驰在连绵细雨中的太行山上。我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位手提冲锋枪、多次进出地委大楼的“小杨”，即红字号“红大”副总指挥杨万盛。我边开车边思索：从那场战斗到现在，茫茫然四十年逝去，杨万盛也应年过

花甲，他还能记得那血腥的一天吗？

杨万盛的血火经历，在晋东南红字号头头们当中，有一定代表性。他不是纯正的造反派，而属于企业内部、单位内部被迫向社会统一战线靠拢的“保守派”。军分区组织全区夺权，他们并没有参加。地区建筑公司成立“战斗队”，选头头还要选群众愿意服管的人。杨万盛根红苗正，是贫农继养的儿子，1957年在山西建筑学校入团，毕业分配到专建任技术员。文革爆发时，他已经有了好几年工龄。——这批人有一定文化，很自然地成为多数群众的代表人物。他们与积极参与省地市夺权的极端造反派人物，有许多不同。

他在一篇“自诉材料”中写道：

1966年12月，我以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对毛泽东主席无限崇拜的心情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从参加本单位的“战斗队”开始，卷入斗争，派性越来越严重，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从本单位到社会，从小组到大组织，从一般群众上升到群众组织负责人，以致最后当了派性头头——红字号大联合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到1967年冬，派性进一步恶化，由原来的口头辩论到动手动脚，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至1968年元旦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的行动，无论红字号、联字号，哪一派都是错误的，都造成了生命财产上的巨大损失。这是史无前例的灾难，是对人民的犯罪！我过去总是认为：我是所谓的保守一派，不是造反派，我没有积极参与夺权，我们是受压的……这成了我不认识武斗错误的挡箭牌，没有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要重新认识和彻底否定，两派武斗都搞错了。没有认识到自己当了一派头头，带领群众也干了坏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我感到了对民族的惭愧。我们这些派头头，都应该将功补过，弥补晋东南人民的损失，挽回我人生失去的宝贵时间。

有文化的人才可能是清醒的人。杨万盛这位老中专生的后半辈子十分充实有力。武斗终止，他被“胜利”的联字号判了九年大狱，两条腿差点给整没了。出狱后文革结束，他立即投身到专业中，被评选为优秀工程师，获省部级施工技术一等奖，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可见一个时代可以把人塑造成那样，另一个时代则可以把人塑造成这样。

我找到他时，小杨早已变成了老杨。他退休后，复被邀请聘用，出任长治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我在一家新化肥厂建设工地上，找到了这位施工总监——要称杨总啦。这样一位倍受人们尊重的工程权威，年轻时却日夜冲杀在血腥战场上。

老杨能够相当冷静地回忆往事，客观分析两派斗争。他认为：就当年两派武

装斗争的组织状况做个比较，联字号更坚固更严整一些。联字号各大组织在军分区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下行动，分工较明确，上下信息和战争准备也充分得多。野战军介入晋东南以后，主要信托又是军分区。红字号方面，则以大型淮海兵工厂为核心，尽管淮海厂弟兄们很团结，红字号各路力量也很强大，总体上构成装备精良的一个整师，但是比起军分区、市县武装部和当地驻军而言，毕竟不是一个稳固系统。兵工厂再大，却不涉及全区市县地方权利。红字号各战团势必分散。红字号赴京赴并（并，太原简称）反映问题，总不如军分区向省军区、省军区向北京军区来得快，最后，联字号上层打击了刘格平，北京军区直接抓了红字号领导干部。中央高层急于制止动乱，召开“九大”，便以“抓坏人”的形式收拾乱局，扑灭战火，重新瓜分权力。刘格平虽然支持红字号，曾经亲自到晋东南来撑腰，但是他不能直接领导军分区和武装部，省地革委会大分裂，联合统一受阻无望。海军、空军又不能实际执掌地方政权，形不成自上而下的系统斗争局面。武斗后期，谢振华率 69 军在山西全面支左，军地一手抓，正面进军，强硬占领，联字号积极呼应配合，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相形之下，红字号是自愿组合性质，刘格平失势，群龙无首。我们都有些“雷刚式”的盲动，尽管红字号在长治百姓中占了多数，武装力量也很强，局部都有战斗力，但全局性组织不力，指挥部缺乏上下完整体系，仍然打不过正规军和野战军，虽是多数，也会战败。

杨万盛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他沉沉忆道：“战争打到最后，重兵压境，伤亡严重，实在没有退路了，紧急开会研究时，有人一气之下提出，各个副指挥和红字号的干部头头们，带领骨干人马退守到淮海兵工厂的厂区内部，以国防工厂为壁垒组织抵抗，誓不投降，除非军队彻底毁掉此工厂！然后再集中兵力，待机收复长治。这个方案不现实啊，红字号陷入非常悲壮的境地，我清楚地记得，长运头头刘周娃，听到这个方案时捂住脸痛哭！”

野战军压境，联字号进剿，红字号惨败。总指挥赵震元以及地县几十号头头，都让联字号在执政中给枪毙了……

我向老杨提到了发生在地委大楼前后的那场战斗，我奇怪为什么这场战斗在两派史料中未见记载。我向他提醒，一楼大厅，你们对死者实施了抢救，还有中弹的部位，中午吃带血的包子。老杨猛然间记起此战，很惊诧我怎么知道得这般详细。他说确有这一仗：

当时，红字号在西招待所等地建立较大据点，是为了武装保卫某某执政的地区革命委员会。说起来这是向上海学习经验，即工人纠察队武装保卫新生政权。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中，也很欣赏这个做法。实际上，革委会根本无法行使权力，

这一带反而变成了双方激烈冲突的战场。联字号以四零火箭筒等重武器，大白天袭击了西招，抢占天主堂大院、广播电台和友谊小学等有利地形，近距离对我方指挥部构成严重威胁，联字号要保护天主堂大院背后的医专大据点，保护军分区。双方形成对攻。中间地带很重要，我们占不了，也不允许他们占领。双方在这里多次拉锯作战。你所说的那一天，应是1968年2月初。天快亮时，他们再次袭击西招，所以我们吃罢早饭，战斗动员到半前晌，就集合反击出去了。那一次天主堂大院门前打得最厉害。那位死者，正是我们专建的一个头头，叫赵怀忠，担任一支作战分队的队长。赵怀忠在冲到天主堂大门时，被对方冲锋枪，或者自动步枪击中，倒在大门前空地上，战友们用密集火力掩护，是我带人冲上去，连滚带爬把他拖下来的。抬回地委大楼里救护，他胸部中了四弹，人已经死了。赵怀忠战死，对我们专建一百多名战士很震动，因为他是个队长。

专建队员中还有一人送了命，也让老杨难忘：这位队员叫李天法，本来已经回了晋城老家，他洗手不干了。当时老杨他们觉得人手少，又怕他独自返家后被对立派抓走，便派人去晋城追到村里，把他叫了回来，让他继续坚持战斗。结果，最终让联字号把他枪毙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对不住他，心里一直是愧疚的。

地委这一仗，为什么不见双方记载呢？老杨告诉我：此类战斗已到了频繁发生的时候，两边的报纸传单早就停了，事后也不会有人去补记这些局部战斗。除非是两派认为有必要揭露某项罪行，才会提到。这在当时算是很局部很普通的一仗，那么多大战还记不过来呢，你要不细问，连我都想不起来。这些小仗天天打，哪里顾得上记载？

许多文革场景血火史实，就这样在人们的记忆中流逝而去，我们是多么健忘啊。我提到专建的炮楼扫射了一伙青少年，老杨说那时他身在攻击火线上，这类误伤实在记不得了。

老婆婆的生与死

我家所居住的报社院，被彻底封闭在战火死胡同中。那袋子沾满血腥的白面加上原先余粮，还有一些去冬的菜蔬，保障了我们五口之家不被饿死。水呢？水怎么办？万幸啊万幸，就在我家房屋南侧五米处，居然有一口老井。我和父亲移开了井口老条石，用早就备好的一根长绳和铁皮桶，从井中吊水吃。我那时力气小，须半桶半桶地打水，才能把水桶拔上来。井台上冰砣遍地。

全家几乎不点灯，点灯有害无利。

更巧的是，我家三间大平房，脚下竟然有一间十分坚固的老地下室。我想不

通当初荷兰教士们在修造这片建筑群落时，为什么到处安设地下室？许是让上党义和团给杀怕了。现在我们不用出门，从家里一角就可以钻下台阶，进入方方整整一间防空洞内。任你地面上炮弹飞来飞去。

天无绝人之路。有粮，有水，有地下防空，再坚持个把月也是可行的。不就是一天只喝一顿菜粮稀粥嘛。

四四方方一座院子，我家在东部，西部平房那边，已经让联字号武装凿通了。南可进退军分区，北可出击地委大楼背后。夜半，时有武装小队在“咚咚”的奔跑声中往复穿行。每逢此刻，我父亲都要站在板凳上，抽出窗上活动砖头，向外仔细观察。某夜晚他正瞭望时，当院落下一发炮弹——随着爆炸巨响，老爸当即从板凳上后仰，跌倒在地板上。说不清是由于气浪冲击还是他要做后仰式卧倒动作。

父亲倒地瞬间，急促指挥我妈及我们：快，地下室！

于是，我们如鼯鼠小队，跟在母鼯鼠背后，哧溜哧溜鱼贯而下，我父亲最后压阵进入。

自从我的富农奶奶被驱逐回乡，我妈陪送奶奶从冀中归来，她们地委妇联会干部就总是集中住学习班。偶尔回家时，老妈脸上再也不见慈爱笑意，甚至很少说话。现在她牵头拾阶而下防空洞，我总是在半途台阶上，及时擦亮火柴，把她手中一支蜡烛点燃。这个烛台，是她的妇联会同事们从遥远的莫斯科带回来的礼物：一座铜质雕塑，十月革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穿半截大衣，一手持火炬，一手举至半空，招呼无产阶级暴力战士前进。那手中火炬，正是一段可供点燃的蜡烛。

列宁同志和他的中共妇女联合会太行山同志，高举着蜡烛，照亮了这间具有异教风格的地下室。我们散坐小板凳上，在沉默中等待天明。四周是上党地区典型的农产品：一堆山药蛋加上萝卜白菜。

母亲长时间沉默着，偶尔才说一句半句话。她们长期从事的工作——为提高新中国妇女地位而奋斗，现在看来可以暂告终结了。她的领导人，曾经的华北妇女运动领袖们，无一不在被打倒与受侮辱之列。而出自昔阳县偏僻山寨的铁姑娘，一些暴烈的阶级斗争新女性，和一些把毛泽东著作倒背如流的女标兵们，必将呼之欲出，取而代之。

地面上炮声隆隆。

我家房屋后窗，正是军分区后大门。门内有一座仍是荷兰传教士们主持修造的三层青砖楼。每天夜里，这楼上的马克辛重机枪，紧握在军人们手中，向着红字号地委大楼方向射击，打出一种沉闷且不甚连贯的“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夹杂在远远近近枪炮声合奏里，极为古怪。这一切，与我们常见的战争电影情景，

很少相同之处。阵地战？突击战？运动战？游击战？巷战？守城战？夜袭战？混战？似乎都不像。

我们沉默着，等待着天亮。

在又一次天亮时候，我们全家着实吃了一惊：隔壁近邻那位半大脚老婆婆，披一身战火硝烟，不知从哪里归来了。

她的归来，使整个荒寂大院的人数增加到七口。——我们家五口，西南角上，留守着一位早年当过乡村私塾教师的高平老头儿，加上老婆婆，全院共计七口活人。而原先这院中，大人小孩总有近百生灵。

在惨淡冬日阳光下，我帮助私塾老头儿和新归来的老婆儿各打半桶井水。老婆儿向老头儿发出邀请：上咱家吃一口吧！老头儿自信有些文化，坚守着“男女授受不亲”古远信条，摆手拒绝了老婆儿的美意，回家独啃干饼而去。孤独寂寞啊！我注意到，这位老头儿无书可看，整天坐在雪地里弹坑前，翻一册《成语辞典》，以浓重乡音时时咏念：杀鸡吓猴，调虎离山，集腋成裘……

这位孤寡老妇，平日里被我们小孩儿直称为“老婆子”，是一位地委王姓干部的母亲，可能因为房子紧，她没有与儿子同住一起。她的房舍向前凸出了一间小厨房，当她长久地隐蔽在厨房边，独自探头观察院内动态时，从我家一侧便可以看到她的后背。每当这时，我就会招呼弟妹们说：快来瞧，老婆子又往外侦察哩！

从她隐蔽侧身探头观望的姿势看，老婆子也具备一定程度的战争知识，或者农村阶级斗争经验。

这位老妇来自平顺县山区，性格异常坚韧顽强。她的形象，一点儿也不像传统中国女人，而像非洲部落里的男性酋长。黝黑宽阔的面庞上纵横布满皱纹，鼻子阔大，长嘴巴在鼻下一字横排。奇异处在于，她的夏日生活完全是赤背光膀，呈半裸大仙状态。太阳将她的上半身晒成棕色，两只曾经硕大的乳房垂吊于胸前，摇摇晃晃，挎上篮子出门进院，旁若无人，这就更像非洲人。傍晚时分，她兀自蹲在院中自来水管下，腰际挂个大裤衩，拧开水管子，哗哗地洗澡。她的赤裸存在，与这座干部众多和城市少年云集的院子，极不协调。于是她时常受到人们白眼侧目。我亦很不懂事地参与过伙伴们的齐声起哄：

“老婆子，骑骡子，骡子蹬，蹬住老婆子脚后跟！”

她为什么习惯于赤身半裸生活？这在上党地区妇女群落中极为罕见。太行山下河北河南村妇们有这个习惯吗？也许吧。我母亲专职从事妇女工作，曾经婉转地劝告她，请她穿上一件背心或者小褂（乳罩自然谈不上），老婆子却毫不在意，依然赤身露背，面无表情，行走自如。

她从来没有生过病。精神上和心理上也未见任何病症，和我家的邻里关系也

颇正常。平日她凡人不理，独自往来。相形之下，我的冀中奶奶黑袄白领，银发不乱，比她文明许多，不是一个档次。有时她们面对面站在院里说话，神情亦很和睦。对院里进进出出的红卫兵后生们，老婆婆保持一种冷漠态度，不理不睬。她认为这些人与斗争她儿子王干部的红卫兵们，大体上是一回事。

那年冬初，上党古城战云密布。这位老妇也颠着她那半大脚，忙忙碌碌地储备菜粮。她今天带回一只南瓜，明天带回半篮豆角，后天弄回几只土豆，从容储存在自己家中。我时常好奇地溜进她家观看，发现她的家舍早已变成了一间农产品仓库，带皮玉米拴在一起码在墙角，豆角用线绳串成长链，在空中交叉晾挂着，南瓜被刨成丝条晒着，土豆更多，真是琳琅满目，生动鲜活，足够她吃到次年春后。整个家中弥漫着农村田野香甜气息，又和城市贫民家中常有的腐朽气息混做一团。不知为什么，我那时特别愿意在她的奇异小屋里站一站，看一看。这里有许多书本上读不到的乡土知识和城市中十分罕见的怪异景象。比如，她把煤核儿与柴禾一起烧用，烤出了香喷喷的柿子渣粗粮饼；比如铁锅里加沙子，炒出了焦黄的小面蛋蛋和豆子，很酥脆，还带些土质……

“来干甚哩？”她总这样问我。

“瞧一瞧。”我总这样回答。

“有甚好瞧，瞧到眼里拔不出来。”老婆子自顾自忙她的事，二人便不再过话。我站一阵子，也就走开去。

那天战斗中，她曾经高声呼唤我。一连数日她没有归来，我们以为她被枪弹击中，被打死了。不期然她却静悄悄摸了回来。我们想不通她从哪里进入这座封闭大院的？院门早已从里头顶死。莫非她是从军分区大院武装队员的隐蔽通道钻回来的？真真不可思议。

我又一次站到了她的房中，我好奇，想知道她那天是怎样脱险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她那只常备不懈的篮子里，这回不是躺着萝卜土豆，而是躺着一颗长治淮海兵工厂产品：白色木柄黑头军用手榴弹！此弹除了木柄尚未涂漆，其余都很标准：重 600 克，合一斤二两，拧开弹尾螺旋铁盖，有一层防潮纸，要用力捅破。抠出一根白色线绳，也可能是丝质的，很结实。线绳头上有一个银色金属圆环，像钥匙环，须套在小拇指上。甩出实弹时，手腕回扣，小拇指要用力回勾。拉火线需要 8 公斤的力量才能猛然拉出，线的另一头有 3 厘米长的黑色摩擦段，从而引爆。力量不足 8 公斤时，这小绳可以空吊起实弹而无危险。作战中，手榴弹在瞬间投出，持续 3 秒至 3.8 秒爆炸，这正是弹体飞行的时空。当然，一手拉弦，一手投弹，也是可以的。

投掷手榴弹是一名步兵最基本的看家本领。

现在，这颗手榴弹躺在老婆子篮中，弹尾被她用肮脏的棉布裹了，一根毛线

绳捆住了布头，说明这颗手榴弹缺失了后部的螺旋铁盖。我曾在刚刚结束战斗的马路上见过这种残弹，应是投掷它的人缺乏经验，慌乱中拧开盖子，未能有效拉动白丝线便投了出去，因而未炸。老婆子显然是从战场上拾捡回来的，这万分危险的宝贝。

她具备这类常识吗？她年轻时使用过军火武器吗？

她注意到了我的惊骇，便警告说：“又瞧哩？没见过？你可不敢动它！咱院儿也要防坏人。”

老婆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顿时高大起来。她居然敢于使用真正的军火武器。至少她想到了凭借手榴弹吓唬坏人。

“你会炸不会炸？”我这样问她。

“有甚会不会。”她很随便地说。

当天，我忍不住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当时一怔，然后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独自动身到老婆子那厢去了。他坚决阻止我跟他一起过去。于是我们全家躲在门口，观察这件事情的动态：老爸要干什么？

好半天，我父亲从老婆子家一撩门帘子，出来了。他怀里肯定揣着那颗炸弹。他路过家门口未停，径自朝布满冰雪的井台那边走去。

很快，我父亲从井台归来，静悄悄地，一言不发。

我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我们已经明白了结果：我父亲做通了老婆子的工作，并且取上这颗手榴弹，走到井边，把它当成一个石块，“扑哧”一声投入深井中，让它永远锈沉在井底吧。

我父亲拍打拍打双手，像是宣告这件事情的结束。

然而老婆子的文革命运并没有结束。

大战打到后来，红字号战败，联字号执掌了晋东南大权。绝大部分地委干部被下放农村。这些昔日的老权贵们必须给文革新权贵们让出大楼来，让出家属院来，让出地盘来。这种下放是全家动迁，遥遥无期。

我要说的是，那位我一直惦记着的老婆婆，仍然顽强地居住在她的小屋里，生活没有变化，又到了夏天光膀子季节。糟糕处在于，我们家走了，她的近邻变了。变成谁家了？说出来难以置信，那位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并为联字号屡立战功的头号大将王司令，携全家搬入了我家腾空后的三间大平房。从此王司令不再当工人。

王是胜利者的大司令，自搬入此院，往往来来，造反战友们前来拜会者甚多。出于可想而知的缘故，他们与近邻老婆婆碰出了矛盾，发生了口角，进而造成冲突。据知情者后来相告，这位顽强的山区老妇，在冲突中抱住了某头头的腿，造

反派弟兄们动了脾气，他们自从在战火中夺取胜利以来，意气风发，许久没有动过拳脚了。老婆子居然敢抱我们头头的大腿，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于是，战将们一顿臭骂猛踢，用威武的大头皮鞋，把这位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老人给活活踢死了。据说她身体尚强，在医院里坚持着不想死，却没有救过来，她到底还是牺牲在了惨烈的劫难中。那一年，她该是将近七十岁吧。即便是年轻人，也架不住这般猛踢。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人非常哀伤，我们沉默，我们无语。

我长期不知道她的尊姓大名。普通山区百姓，谁会记得她们的姓名？老婆子就这样赤条条死去。

她的儿子王干部，屡挨批斗，自身艰难，没能保护住他的母亲。老婆婆惨死后，曾经引发了老住户们普遍同情和强烈不满。而各家各户，早已破败无望，自顾不暇，谁也管不得此事了。

还需补充一句，老婆婆的儿子王干部，其倾向属于红字号观点，老婆婆算是红字号家老妈。这和她死在联字号脚下，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红字号弟兄们，同样猛踢过联字号年迈的父母亲。仇恨多多啊。

我总是在想，假如，顽强的老婆婆留着那颗优质手榴弹，事情又会怎样？她敢不敢扔出去？如不敢扔，她干嘛把它捡回来？

那一年，到这个时候，我就满了十三周岁了。

少年人的伤痛

到了1969年夏秋，晋东南两派战火基本平熄。地委干部们依旧惶惶不可终日，大多数人家都要离开长治，到农村插队落户。而我和一帮小弟兄，在集体失学两年后，很怪异地入校长治一中，大家扎堆儿鬼混，流浪不停。

这时，我们整出了一起“大案要案”。尽管我只是一名“胁从小匪”，却也饱尝惊吓之苦。

军分区携联字号大军剿灭了红字号，正在大力巩固新生政权。红字号一派残余仍在“垂死挣扎”之中。红色电波传来“九大”捷报：被联字号拥推为全区政委的老劳模李顺达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派首长、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消息，对于浴血奋战苦斗牺牲的山西联字号军民来说，该是多么重大的喜讯啊。于是，每到夜晚，地区大礼堂便成了“联总”欢歌庆贺的场所。无数支来自各县市和各大厂矿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场接一场，歌舞喧天，排队献演。我们这群少年无业游民，成了观看演出的常客。

问题就出在这里。

比我年龄大些的几位兄长，此刻精力过剩，最爱无事生非。腰间别着来源不明的伪劣短枪，或者匕首刮刀，迷恋于驾驶汽车，而且人人生出了开车狂瘾，一见汽车就想发动。

这中间，那位刘四平老兄，太行中学初中生，就是前头战斗中被流弹洞穿屁股的那位，幸被红字号战地医院救得性命。此刻枪伤刚好利索。四平兄生得精明强干，伙同鲁老三、吴吉安、谭海成、李长武、小和和等人，啸聚街头，群架不断，我在这一团伙中，刚满十四岁，算个小兄弟。

今夜，地区大礼堂演出特别重要。中央委员李顺达“九大”荣归，亲率平顺县西沟大队申纪兰等忠诚坚定的联字号乡亲们，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前来长治，共享胜利大典。

礼堂门前岗哨林立，联字号诸首长弹冠相庆。

西沟村的大卡车，稳稳地停放在礼堂广场上。在它周边，依次停放着十多辆吉普车，还有小轿车。

灯火阑珊处，我跟随刘四平、鲁老三等人来到卡车前。

我们这伙儿小兄弟，年龄最大者莫过十七八岁，不懂得什么政权危机，也不懂得阶级斗争新动向。总之，不懂得这是李顺达的卡车，开动它要惹多大的祸灾。

鲁老三、刘四平等进了驾驶室，我和其余四人爬上卡车车厢。除了佩服老大哥驾车技艺，我还能想到别的？

整个过程，竟然未被礼堂附近的武装人员发现。我们顺利地驶离礼堂广场，欢快地向城市北部郊区前进。晚风吹拂着我的脸庞，心情无比舒畅，期盼着老大哥们轮番过瘾之余，能够腾出一小块儿时段，让我也摸一摸方向盘，练练身手。

当晚，卡车在郊外道路上安全行驶 60 公里，各人都美了一阵子，最终停放在北郊太行中学东墙之外。

我们步行回到市内。却不知礼堂那边演出结束，早已炸营乱套。想一想，李顺达西沟大队一台重型卡车，在如此重要的时刻和地点，竟然丢失于庆典活动高峰期，这不是红字号残余的现行破坏活动又是什么？当晚，联字号政权之强大专政机构紧急出动，四处追侦寻察，终于在黎明时分，发现了卡车停放地，随即布设了严密埋伏，安放重兵布控，等待着阶级敌人再次到来。

次日上午，日光大明。我们从横七竖八的拥睡中醒来。回想昨夜驾车兜风，人人余兴尚在。一位老兄提出即刻前往练车，还说油箱存油尚多，白天视线良好，正可磨练车技，多数人雀跃响应。有人则隐隐担忧说，二次前去凶多吉少，不如找些吃喝，歇手罢了。说来说去，群体的力量大于个体，我们还是架不住手痒心痴，大伙儿便稀里糊涂前往人家设好的埋伏圈，却全然不知凶险将临。

哲人说：唯年轻人的盲从是可以谅解的。

深绿色大卡车依旧停在太行中学东墙外。隔着一片田野望去，除了强大诱惑，周边并无异样。

卡车启动后，我们驶上长邯公路。谁也没有发觉，身后已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尾随而来。人家不打算即刻下手抓捕我们，而是要跟踪侦察一番，看看这是一伙什么人，又将把卡车开向何处？待摸清敌人意图之后，少不得将其黑窝点一举剿灭。

我没有资格坐在驾驶室内，只能和长武兄迎风站立在车厢上。卡车向着山西南部边境黎城县疾驶。每行十来公里，调换一人，轮流驾车过瘾，阳光一团团扑面而来，田野一片片随风飘去，太行山区景色无限。长武兄禁不住巨大喜悦，从腰间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打开保险，在公路两侧随意选择目标，连连开枪射击。打到放任时，但见前方有耕牛缓行，长武兄举枪射牛耍乐，偏偏这一枪竟哑火了，我们当即取笑他的笨拙，他就抱怨枪的伪劣，谁也不管枪响牛亡的后果该有多么严重。

想来是担心汽油不足，在临近黎城时，卡车实施公路调头，换人，我们向着长治方向返回。

中午，我们驶回城市北郊。正待停车逃逸，突然，身后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有两辆摩托车轰然窜到卡车前面拦截，后边是两辆 212 吉普车，鸣响警报，对空射击，紧紧追随。摩托车上，有凶悍干警挥舞短枪，回首探身威逼我们停车。

人家跟随了这一路，看清了车上不过是一伙儿少年毛贼，便在我们进城前实行抓捕。

弟兄们中间，要数鲁老三驾龄最长，技术也最好，此刻正是他在驾车前进。我在车厢顶上，并不知老三当时想法，只觉得卡车猛地轰响了油门，喇叭连续响起，天啊，这位疯狂少年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冲进了市区，一路狂奔，冲进了市内南北主干大街。我哈下腰来，慎防中弹，探头向车厢外面观看，大街上早已炸了营。摩托车上，警官前后左右连续开枪，吉普车警报撕心裂肺，行人眼见一辆大卡车如野牛般冲上前来，慌忙躲避犹恐不及，大街上一片恐怖叫嚷，前方闪开了空旷大道。

疾风掠耳，鲁老三驾驶卡车一路前冲，从北城向南开，冲过十字大街，又直贯南城，前后数公里长街决不停车，致使流言纷起，人们不能不认为，这是红字号残余又一次疯狂反扑。

卡车冲到南城，冲到下南街路口，突然一个栽头猛拐，向西，刮风般掠过我的母校长治一中，直奔西郊长子门桥头。鲁老三猛踩紧急制动，卡车蹦跳着停住，鲁老三打开车门，箭一般窜到桥墩之下，但听兄长们大叫：快跑！我急急跳下车来，拼命向附近小树林跑去。

我回头仓皇张望，只见随即而至的大批干警，迅速包围了这辆解放牌载重卡车。不好，有一位同伙被捉，那是和和，跑动迟缓了半步，即被众军警按倒在尘埃之中。

我在荒野里狂奔一气。天黑以后，倒头栽入庄稼秸堆，昏睡至夜深。后半夜口渴醒来，独自仰看满天星斗，新月如钩。

次日黎明，先找水喝。然后，我只身潜回市内，悄悄爬上刘四平老兄家对面房顶。我伏在房坡上，持久地观察院内动态。我担心那位和和被捉，少不得一夜严刑拷打，任谁也要招出同党来。说不定，人家马上就会来家搜捕，一一捉拿诸兄归案。正思虑间，果然看见一批武装军警，涌入刘家排房院中。我伏在瓦坡上，居高临下，眼看着成年军警们铐了帅哥刘兄，一路推搡，押往院外去也。

惶恐之中，我溜下房坡，找到了在卡车上频频开枪的长武兄，二人紧急商议对策。我提出外逃晋城的想法，长武兄却不同意，反而要我同他一起前往市公安局自首。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何。后来悟到：长武兄的父亲，是地区联字号干部当中一位受到军分区关照的领导，受命主管“五七”干校，时有声望，只要长武兄尊听父嘱，主动前去自首，依照胁从不问惯例，说清楚他人责任，也就没事儿了。至于我，小屁孩儿一个，在同案犯中年龄最小，不足十四岁而已，进去挨上一顿臭骂，恐不至于关押办罪。这便是长武兄的计议了。

我胆颤心惊地跟在长武兄后头，对自首之事百般犹豫。二人到达市公安局门口，即被门岗拦住。就在长武兄向门岗通报事由的瞬间，我一跺脚，转身逃离开去，像一条游鱼，钻入了人流中，又辗转逃回一中宿舍，蒙头大睡……

此案结局也不复杂：公安局获悉李顺达生产队汽车“被盗”，如临大敌，当晚发现车辆，跟踪侦察“阶级敌人新动向”，次日上演街头飙车一幕。抓捕审讯后，始知一群顽劣少年练车过瘾，不过一场虚惊。于是，对首犯刘四平、鲁老三关押月余，对其余毛贼也就懒得深究了。

就是在这种情景下，我随同几位老哥，进入晋城王台煤矿新矿工培训班，混饭一时。结果，在晋城高庄培训时，人家发现我是一名童工，且手续不全，因而遣返长治一中，交付长治一中工宣队。

学校工宣队成员，多系一派斗争胜利者。为了整顿“复课闹革命”之校园秩序，他们多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连续批斗“反动教职员工”以及各班级调皮捣蛋的“坏学生”，无休无止。由于“学军”，全校把各年级叫做连，把各班级叫做排。我是四连某排（初一）不听话的学生之一，于是工宣队先是将我从79班调往78班，即从某排调往某排，以分散瓦解少年团伙。

校园秩序依然混乱。工宣队只顾震慑乱局，很快在学生中挑选了九名捣蛋孩子，当作“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典型，拉上数千人的全校师生大会，展开猛烈批斗。当时，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非常普遍，实乃“一抓就灵”之最佳形式。

斗就斗吧，没有奈何。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吴增义、王可夫等一批小弟兄，年龄不过十四五岁，此刻被拉在大会高台上，站成一排，变做斗争对象，照样履行“低头认罪，抬头示众”那一套，台下黑压压无数同学，跟着工宣队师傅机械地呼喊口号。少年心灵倍受摧残。

光天化日之下，我生平首次登上高台，面对如此众多的全校革命师生“示众”，顿时觉出了丢人害臊，也感觉到了生活的无望。几年来，常是我们在台下观看耍猴般斗争成年人，今日怎么把我们拉到上面来了？记忆中，几位小兄弟的罪名，或因住校期间夜半饥饿而偷鸡盗米，或因电话谎报火情导致消防车赴校空跑，更有课堂上大笑起哄者，讥讽工宣队员念错汉字者，参与打架斗殴者，不一而足……工宣队员认为，那么凶狠的阶级敌人都斗垮了，尔等乳毛小贼竟敢如此猖獗，岂有不斗之理？

我的罪名同是“破坏复课闹革命”，具体事实两条：一是跟上王可夫等人，参与殴打本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烧包”队员；二是擅自跑到晋城王台煤矿，要下井挖煤，当煤矿工人被遣返，前后离校一个多月，无可辩驳地构成“破坏”罪。此前，已在班级内部由军队的女儿们批判我多次，这回一并拉到大会上亮相揪斗。

会场上口号声声，我偷眼斜视身边肃立无语的吴增义老兄，只见他身如麻杆，营养不良，尖嘴细腮，在与我肩并肩低头认罪抑或抬头示众时，神态十分狼狈。又想到上午，他强调过自己的预感，说下午开大会，怕是没好事，咱们不去学校吧？而我混充硬汉，要来看看，等于拉他一起自投罗网。工宣队长主持大会，人家逐一点名，我等即被揪上高台。此刻，我见他皱眉烦恼，且无比严肃，便觉得好笑，继而又见他斜眼瞅我，分明是报怨：我说不来吧，你逞能要来，瞧瞧这光景！我知他心有怨气，更感到万分滑稽，心想平时你老吴满嘴俏皮话儿，现在咋一句也不说啦？我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在最后的低头认罪之中，我憋忍不住，低着头吃吃笑了一声。增义兄立即做出反应，他低声嘟囔道：笑屁哩你？进而我们笑出了动静来。来自清华机械厂的工宣队师傅们，及时发现了这一新动向，好啊，全校批斗大会还镇不住尔等无耻的笑意吗？便只有好打。当即，我和我的同党们在台上猛挨一顿老拳，麦克风里一并传出清脆的耳光声。其中，有脆弱者将泪花滴落在“立正站好”的两脚之间，但听工宣队一名黑脸师傅大吼：哭什么哭！

接下来，有早熟的男女同学纷纷登台，诵念批判稿，上纲上线，听凭工宣师傅调遣。搁今天夸张话语，这批老友或可称之为“左翼”吧？

……那天以后，我们十多个少年人统统不再上学，再也没有回到校园。至少白天不再回去，有时，晚上与王可夫回到校园那无比肮脏的宿舍里睡觉。我们时而流落街头，时而拥挤在吴增义家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时而涌向体委露天游泳池，饥一顿饱一顿，混一天算一天，野草荒坡，无人料理。精神空虚的破落子弟们，唱情歌，读禁书，打群架，偷东西，无事生非，恨不能上山当土匪去。总之是生逢乱世，没有安稳的好世道，也没有安稳的青少年。

很快，传来消息，说校方已将我等除名，噫，说白了，就是这帮小王八蛋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对此，我和老吴并不感到多么难过，反正许多小弟兄都在校外游荡着。而精神上、颜面上倍受打击的重伤，还是亮相于千人大会猛挨批斗这件事。台下必有美丽的女同学，瞪眼看到了全过程，让我等男儿丢人现眼，饱受欺凌，无地自容，脸皮便也更厚些。

一场触及亿万人灵魂的大革命，小孩子亦不能放过。从此，那个大时代以及人间大社会，在我们心目中暗淡下来，心存悸动，心生怀疑，不再神圣。

直到今天，我没有得到长治一中的初中毕业证书。当然，亲爱的母校依然是我心中的圣地。在那里，我毕竟学会了一句英语，乃“毛主席万岁”，其读音好像是“唯唯匙、千门帽”，也不知晓对不对？

街头流落一段时日，天气渐冷。某天回到家里，见父母正在收拾东西，家中一片狼藉。他们不住学习班了？这是准备搬家吗？父亲抬头看我，知我十分落魄，便说：不去学校吗？不去就不去吧，快来一块儿收拾东西。

哪有什么东西值得收拾？一些书籍，多数弃之不取，少量马恩列斯毛，装到麻袋里，烟尘四起。家具都是公家的，红漆编了号，一一置于墙边。我终于明白，我就要离开这座战后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早晨，天空雪花飞扬。一辆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大卡车，停在院子门口，这车与我们疯狂驾驶的那辆车，犹如一个模子刻出来，只是乘客心绪迥然不同。司机一人，押送一人。体弱的母亲进入驾驶室，我抱着家里那只老母鸡，和弟弟妹妹坐在卡车上。父亲爬上来，在一堆锅碗瓢盆中间，挤出一块地方坐下。

沉默中，忽见我的挚友吴增义和刘小四，从风雪中走来，后边又来了高明宪。三位老兄冻得脸庞刷白，只顾往棉衣袖口上抹鼻涕。可叹弟兄们闻讯赶来送我，令我感动。当即跳下车厢，与三人话别。心中凄苦，不堪言语，只会说：多多写信吧。大伙儿再也找不到其他话语……

寒风凛冽，道路颠簸。卡车越过荒山野岭，越过高平大地，这里是历史上因残酷而著名的长平之战古战场，也是不久前两派血火大战的厮杀地。

解放牌卡车拉着我们全家五口人，向南部乡镇驶去。山路上风雪弥漫，将我的心灵和肉体冻了一个透彻。

2013 年 12 月修改于山西作协

【编读往来】

读者石名岗来信提出订正：在 150 期的《〈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作者简介》中，李辅的出生年“1934 年”有误，应为 1939 年。